

第六章 佛塔与佛像

佛塔部分

○舍利

《法华玄赞》卷二曰：「梵云设利罗，体也。舍利者，讹也。」《资持记》卷下四之一曰：「舍利，此翻遗身。即死尸也。」《玄应音义》卷六曰：「舍利，正音设利罗，译云身骨，舍利有全身者，有碎身者。」舍利（sarira）近代译为“设利罗”、“室利罗”，在印度是“死尸”的总称。《俱舍光记》卷八曰：「驮都，即佛身界也。亦名设利罗。唐言体，佛身体也。旧云舍利，讹也。」

但是“舍利”在“汉传佛教”则一直被视为佛教的专用名词，与死尸有别。《秘藏记》曰：「天竺呼米粒为舍利。佛舍利亦似米粒，是故曰舍利也。」“全身舍利”者，如多宝佛之舍利是也；“碎身舍利”者，如释迦牟尼佛之舍利是也。《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为难得，最上福田。」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提到佛临涅槃时，嘱咐阿难：「阿难！汝欲藏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毡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第二大铁椁中，旃檀香次重于外，积重名香，厚衣其上而阁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造化。」这是提到处理佛陀遗体如何入棺、火化的记述。

佛陀舍利是指佛陀火化后的遗物，其骨舍利，其色白；发舍利，其色黑；肉舍利，其色赤。《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说：「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及「是舍利者，即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重」因为象征着“遗教不灭”，并具有灵验性，佛陀舍利就成为佛门传世的圣物，拥有佛陀舍利的佛寺，名气自然大增。

○佛陀舍利塔的型制

塔的梵音（stupa，巴利文 Thupa）翻译成汉音为「窣堵波」、私偷簸，简称偷婆、塔婆、兜婆、浮图、佛图，或称土巴（巴利语 Thupa），转音为塔婆（Tope），在缅甸称为（Pagoda）、锡兰称为（Dagaba），后来汉地又称宝塔。魏晋以后，特别造出了「塔」之一字，所以才有「塔婆」之称。若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来看，「浮屠」——塔婆是代表奉祀「佛」真身与精神的场所。最初「佛」的梵文发音（Buddha），到西域转音成（Budo），原来翻译成用闽南语念「浮屠」的发音为最接近，但借用了「佛」字以后，中国人便专以「浮屠」来称塔了。是知佛在世时，弟子都以佛陀为精神中心；佛涅槃后，就以塔作为精神中心了。

据说在迦毗罗卫国与舍卫国，早期就留存有拘留孙佛（Krakucchanda，断惑佛）、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金寂佛）、迦叶佛（Kasyapa）等佛塔的建造，但也只是传说而

已，并未留下遗迹。Stupa 的原意有三，是堆积、堆高的土墩、高显处或显坟，也有“灵庙”、功德聚、归宗、聚相和灭恶生善处的另外之称，其实就是埋葬火化之后的灰烬和骨灰的土丘冢（mound），是一种墓葬建筑。藏文称为“曲典”，意为保存或储藏佛法之处，为后世礼拜佛陀之地。不过后来将埋藏有舍利的称为“窣堵波”，型制相同但无舍利者称为“支提”（Caitya，福聚，旧译灵庙）净处，而发展成另一种供礼拜的“塔庙”形式。

《寄归传》卷三曰：「大师世尊既涅槃后，人天共集以火焚之。众聚香柴遂成大积。即名此处以为“制底”（Chaitya，支提），是积聚义。…又译，一想世尊众德俱聚于此。二乃积砖土而成之。详传字义如是，或名窣堵波，义亦同此。旧总云塔，别道支提，斯皆讹矣。」《法华义疏》卷十一曰：「依僧祇律，有舍利名塔婆，无舍利名支提。地持云，莫问有无，皆名支提。」《大日经疏》卷五曰：「制底，翻为福聚。谓诸佛一切功德聚在其中。是故世人为求福故，悉皆供养恭敬。」同卷六曰：「复次梵音制底与质多体同，此中秘密谓心为佛塔也。」两者皆为积聚之义，由此可知，此乃是后人为区分舍利之有无，特别之区分也。

窣堵波也借鉴天竺的皇家陵墓，故知古天竺埋葬尸骨的坟冢就是窣堵波，它的型制就是覆钵形的大土冢，冢顶有竖杆及圆盘。后来印度、中亚的塔原则上都离不开类似之造型。传说佛陀被弟子毗舍问及，以后如何才能表达对佛的虔诚时，佛陀没有答话，而是把身上的方形袈裟平铺在地，把佛钵倒扣在袈裟上，再把锡杖竖立在覆钵上，这就形成了印度窣堵波的雏形。

一般天竺佛塔分有五个部分，即基台（Medhi，最下层圆形或方形的基础面）、覆钵（Anda，半球形的主体）、平版台箱（在覆钵上的箱形物，可收藏遗物的方龕，或称圣骸堂）、柱竿（在平版台之上的柱竿）、盖（柱竿上的华盖）五部分，再围以栏楯。基台意指大地，覆钵表征苍天，柱竿代表世界的无形轴线，华盖是天界诸神的象征，平版台箱的遗物是佛陀的示现。所以，塔的半球形是坟墓与天穹，塔具有涅槃与宇宙的双重象征。

佛塔塔身的顶部是“刹”，天竺把幡杆称为“刹”，早期是以须弥座或仰莲座承托刹身，刹杆上套贯相轮，其数目不等。梵语 ksetra 音译为掣多罗、差多罗，即国土、土田之意，而梵汉双举云为「刹土」，再引申更具有梵刹、佛刹（佛国）、僧刹、宝刹之意，于是我们仍见韩国自古即称佛寺为刹(se)至今。刹另有二义，天竺刹帝利是守田主；后人以柱取代刹竿。刹柱头安佛骨舍利，意同土田。塔之别名因之称为“金刹”，意指佛之国土。又以金属所造之刹竿，即塔上之九轮。早期天竺窣堵波的塔刹远望如修剪过的树形，如桑奇窣堵波的塔刹相轮，看来与“菩提树”、“圣树”生长的象征有关，是否如此仍有待研究。

中国的佛塔与印度古代的佛塔相似之处极少，可是仍保留着印度形式的塔刹，据《后汉书·陶谦传》记载贪官笮融所为：「大起浮图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阁堂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图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饭，饭布席于路，其有就食及观者且万余人。」所谓金盘就是金属作的塔刹。

《法华经》之〈授记品〉曰：「起七宝塔，高表金刹。」早期塔刹与中原塔刹也不尽相同，主要是刹座、覆钵、相轮、宝瓶、宝盖、宝珠等六部分组成；中原塔刹则由刹座、仰莲、覆钵、相轮、宝瓶、宝盖、焰光，再上则置仰月和宝珠或华盖组成，塔刹大都以铜铁制成。宝盖呈八角形伞状，每角系有风铎。塔顶四角还必须连系一条拉链与宝盖相连，才能稳定塔刹。

日本法藏馆编纂的《总合佛教大辞典》中记说「窣堵波」塔的结构，塔的基层构造为方形的露盘基台，围以栏杆，并设有供人上下的阶梯；基台上有一覆钵式的建筑型式，空心塔体一方开设门洞通于「塔心室」，内置佛像或佛教圣物，后期则供奉西方三圣，入塔即可拜佛；覆钵之上有刹柱等，覆钵之上就是安置相轮的位置。从刹柱的相轮层级数，在天竺便可看出该塔所埋藏的是佛还是阿罗汉的舍利。地面则围以较大的围栏围住整座塔，围栏另开四道雕饰丰富的牌门。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写大夏国都缚喝国（Balkh）有供奉佛陀的发爪之塔“斯则释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传说「佛陀证果成道后，自菩提树下起，方诣鹿园，时有二商人提谱（Trapusa，帝离扑沙）及波利（Bhallika，博黎迦），遇彼世尊，随其行路之资，遂献面果，佛为说天人之福，十善五戒，如来复授其发爪焉，二长老各归乡后，乃建塔供养。」在《十诵律》卷五十六也记说，须达长者（Sudatta，即给孤独长者）曾向佛陀求取头发和指甲，并起发爪塔供养。这好像是台湾早期流行的「生基」源由，那时的塔是用来供奉佛陀的发爪，还没开始供奉舍利。

《佛本行集经》卷十三、十九及《三藏法数》卷十三提到，帝释天建有“天上四塔”：一. 箭塔，取佛为太子时所带之一箭建塔；二. 发塔，取太子出家时之发建塔；三. 钵塔，取佛将成道时受牧女乳糜之钵建塔；四. 佛牙塔，取佛荼毘（Jhapita，音阇毗多、茶鼻多，即火化）时之佛牙建塔。此为取使用物作纪念建塔之始。

据说佛陀临入涅槃时，有一位弟子问到，以后如何纪念佛陀和教法，佛陀回答只要一堆土能够存放舍利罗（sarira）即可，这也就是建覆钵式塔的由来，就那么简单而已。《长阿含经》记说：「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建塔只是为了纪念佛陀对世人的教诲，并无太多的要求。看来豪华的佛塔只是后世弟子的心愿，后来演变金碧辉煌的佛寺建筑，当然也是后人的多事。后来大乘佛教对佛陀信仰的宣说，越来越崇高伟大，建筑物也逐渐雄伟庄严。

在《大般涅槃经》后分就写说：「佛告阿难，佛般涅槃，荼毗既讫，一切四众收取舍利，置七宝瓶。当于拘尸那伽城内四衢道中起七宝塔，高十三层，上有相轮（harmika，露盘），一切妙宝间杂庄严，一切世间众妙花幡而严饰之。四边栏楯七宝合成，一切庄校靡不周遍。其塔四面，面开一门，层层间次，窻牖相当，安置如来舍利，……其辟支佛塔应十一层，……其阿罗汉塔成以四层，……其转轮王塔亦七宝成，无复层级。」但七宝应该指七种上好的石料雕砌而成，而不是真的用金、银、水晶、真珠、车渠（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等之七宝来建筑塔。

○八种塔、十塔与如来八大宝塔

《十二因缘经》说：「八种塔并有露盘，佛塔八重、菩萨七重、辟支佛（缘觉）六重、四果（罗汉）五重、三果（阿那含）四重、二果（斯陀含）三重、初果（须陀洹）二重。凡僧但蕉叶火珠而已。」《翻译名义集》所说：「八种塔即如来塔、菩萨塔、缘觉塔、阿罗汉塔、阿那含塔、斯陀含塔、须陀洹塔、转轮王塔，此八人灭后，为必当立塔者。」

《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一〈序品〉曰：「……又此光中影现如来不可思议八大宝塔：拘娑罗国净饭王宫，『生处宝塔』；摩伽陀国伽耶城边，菩提树下『成佛宝塔』；波罗奈国鹿野园中，初转法轮『度人宝塔』；舍卫国中给孤独园，与诸外道六月论议，得一切智『声名宝塔』；安达罗国曲女城边，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共梵王天及天帝释十二万众，从三十三天现三道宝阶下阎浮时『神异宝塔』；摩竭陀国王舍城耆闍崛（Grdhrakuta）山，说大般若、法华、一乘心地经等『大乘宝塔』；毗舍离国庵罗卫林，维摩长者不可思议『现疾宝塔』；拘尸那国跋提河边娑罗林中『圆寂宝塔』；如是八塔，大圣化仪，人天有情所皈依处，供养恭敬，为成佛。」其中「圆寂宝塔」藏有佛陀舍利，应属窣堵波，其他七塔则是支提。但藏传密宗的“如来八塔”说法则与此说略异，请另见“如来八塔”栏。

《十诵律》曰：「尔时，阎浮提中起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佛出般涅槃后起十塔，自是以后起无量塔。」又《阿育王经》卷六记曰：「佛入涅槃，起八舍利塔。第九瓮塔，第十炭塔。」于是我们见到“十塔”之称。而《般涅槃经》卷下则以为有“十一塔”，谓：「舍利八分为八塔，第九为瓮塔，第十为定塔，第十一灰塔。」

○供养舍利塔的功德

相传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在《大集经》中记载：「忉利天城东，照明园中有佛发塔；城南，粗涩园中有佛衣塔；城西，欢喜园中有佛钵塔；城北，驾御园中有佛牙塔。」，在《法苑珠林》记说安塔有三意：「一. 表人胜。二. 令他信。三. 为报佛恩。」又记当时，难头禾龙王于半途向阿闍世王强索到佛髻舍利，「即还须弥山下，起水八万四千里，起水晶琉璃塔。」

人间国家则为佛兴建有「十刹」：顶塔、骨塔、牙塔或齿塔、发塔、爪塔、衣塔、钵塔、锡塔、瓶塔、輿塔称为“十刹”。马鸣菩萨在《佛所行赞》中记说“十塔”：「八王起八塔，金瓶及灰炭；如是阎浮提，始起于十塔。」后人便将原五精舍称为五山，与十刹（十塔）并称为天竺的「五山十刹」。

佛陀舍利塔终于成为佛教徒神圣信仰的所在，又因为佛陀舍利会增生，信徒们争相迎请回去供养，就有小型舍利塔（votive）的供奉。“藏传佛教”认为舍利塔是证悟之心的凝点、针尖，有了舍利塔让后世许多的信徒「遇」见了已成就的上师。不过，中土一些高僧埋尸骨的类似冢塔（saririka）就没有如此神圣地被尊崇。

《般若经》说：「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以是故，舍利得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供养供敬舍利故，受天上、人中福乐，常不堕三恶道；如所愿，渐以三乘法入涅槃。」虽然传说佛陀舍利遗留很多，但是永远无法满足信徒的需求，请不到佛陀舍利的信徒，也不必灰心。舍利既有如米粒，则可以米粒替代舍利。

后来，因为舍利子的数量总是不能满足广大的信众，便造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取清净砂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有了替代品以后，舍利塔的尊崇就大大成了必要的摆设。

《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是罽宾国三藏沙门般若奉诏译，经文鼓励波斯匿王建塔以延命。造塔方式则是以泥团造小塔，并附有咒语作观想等方法。说如此所得功德，与造佛塔无差别，当知是人于此一生，不为一切毒药所中；寿命长远，无有横死，好处多多，无法尽录。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更写到：「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其他还有《佛说造塔功德经》、《右绕佛塔功德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及《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篋印陀罗尼经》等等，都述说有造塔的功德。

“地宫”是因应中国深埋习俗的特殊环境所出现的建筑构造。因此中国式的塔下留有地宫的空间，用来珍藏佛陀的舍利及圣物。天竺盛行火葬，没有深埋的习俗，火化后之舍利子就供在塔内。中国为了对佛陀的尊崇，就建造帝王陵寝般的“地宫”珍藏佛陀的舍利及圣物。但值得注意的是南诏地区的塔不设“地宫”，文物不是贮存于塔顶，就是存放在基座内，与内地塔的构造有别。

梁大同三年（西元 537 年），武帝改造丹阳长干寺塔时，佛陀舍利再度出现。《梁书》记说：「初穿土四尺，得龙窟及昔人所舍金、银、环钏、钗钏等诸杂宝。可深九尺许，方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内有铁壶，以盛银坩，坩内有金缕罽，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圆正光洁。函内又有琉璃碗，内有四舍利及发爪，爪有四枚，并为沉香色。」又说：「发青绀色，众僧以手伸之，随手长短，放之则旋屈为蠹形。」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西元 819 年），韩愈因上〈谏迎佛骨表〉被贬为潮州刺史的公告，其中的佛骨就是指位在今陕西扶风县城北十公里法门镇，古寺法门寺（The Famen Temple）中所藏佛的“中指骨节真身”。咸通十四年（西元 873 年）唐懿宗身染重病，内政外交又处理不顺，便于四月八日迎佛骨入宫，以求纾解压力，可惜三个月后仍然病逝。隔年正月四日僖宗下诏送还佛骨，于是法门寺佛骨舍利连同上千件稀世珍宝“归安于塔下之石室——地宫”，此后就一直未被扰动。

西元 1579 年，万历七年时因唐塔崩毁，于是改建为八角楼阁式砖塔，塔高四十七公尺，历时三十年完成；西元 1939 年朱子桥将军集资修缮，曾经开启地宫，怕落入日本侵略军手中，荒称内有青蛇盘据，赶忙封土复原；西元 1966 年红卫兵群集法门寺，打算“破

四旧”打开地宫，因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抗议，红卫兵才罢休；西元 1981 年明代砖塔半壁崩塌，直到西元 1985 年拆除重建法门寺塔，西元 1987 年发现了石盖天井，打开即现“地宫”，此深藏千余年的佛指舍利以及诸多宝藏才复现于世。内有八重宝铜函所珍藏的佛骨舍利四枚，一为真的“灵骨”，另三为供一般人瞻仰的“影骨”仿造品。今新建之“真身塔”其下就是唐代地宫的所在，寺旁亦建有法门寺博物馆，存放当时出土的文物。西元 2002 年的 3 月，台湾的佛教徒就恭迎此真身到台湾。

据说人间现存仅有两颗佛牙，一颗是五世纪末叶时由法献（另有说是法显）从于阗带到南京，后辗转至长安，最后再供奉到北京的龙泉寺，明英宗时此寺改名为灵光寺。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时候，佛塔被毁，使得中国唯一的佛牙重现。而另外一颗佛牙，自古就供奉在斯里兰卡国。

可是据载于唐武宗会昌元年（西元 841 年）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在长安的大庄严寺、崇圣寺、荐福寺、兴福寺各开有佛牙奉礼供信众瞻仰。其来历自古分别传说是：大庄严寺佛牙从天竺人腿肉里将来，护法毗伽罗神将护得来；崇圣寺佛牙是那咤太子从天上将来，交与终南山宣律师；荐福寺佛牙是法界和尚从于阗国将来；兴福寺佛牙从吐蕃将来。“佛牙”只有四颗，其他应称为“佛齿”，竟然四颗佛牙同时出现在中国，或许是中国人“齿”（dan，臼齿）、“牙”（dhatu，犬牙）不分吧！（另见本书第二章于阗国栏，说法有别）

○阿育王建塔

佛陀火化后，依《后分涅槃经》卷下曰：「造八金坛，八师子座，各以七宝而为庄严，其七宝坛各受一斛。」《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九曰：「如来舍利总有一石六斗，分为八分。七分在瞻部洲。其第四分阿罗摩处所得之者，在龙宫供养。」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则记说当时：「帝释谓诸王曰『天当有分』，阿那婆答龙王复作是议，婆罗门即作三分，一诸天，二龙众，三人间，八国重分。天、龙、人王莫不悲感。」即至《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说：「吾（佛）逝百岁，当有王出，于阎浮地，起八万四，如来神庙（tathagatadevakula），周满方城。」

《法华经》之〈药王品〉曰：「火灭已后，收取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以起八万四千塔。」在《广弘明集》中，法琳《破邪论》提到：「东天竺国有阿育王收佛舍利，役使鬼兵，散起八万四千宝塔，遍阎浮提。我此汉土九州之内，并有塔焉。阿育王起塔之时，当此周敬王二十六年丁未岁也（西元前 494 年）。塔兴周世，经十二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西元前 211 年），焚烧典籍，阿育王塔由此沦亡，佛家经传靡知所在。」

阿育王知道法王塔（Dharma-raja Stupa，佛塔）的最高象征，能够树立佛塔并倡导、保卫者，也可同时成就了现世大帝国统治者的神圣地位，体现国家的统一，所以他特别地热衷。于是前往王舍城，开取阿闍世王所建之佛塔，从中取出四升之舍利，余下于原地重建大塔。据说在佛教之前，即有佛塔的存在，在阿育王石柱法敕记中，曾提及他曾扩建过过去佛拘那含牟尼的佛塔。

《佛母般泥洹经》曰：「我般泥洹后，二百岁时，阿育王从八王索八斛四斗舍利，一日中作八万四千浮图。」、《魏书·释老志》亦云：「于（佛灭）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役使鬼神，造八万四千塔，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承其遗迹焉。」

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港口的阿育王寺，是浙东四大丛林之一。寺中供奉着据说是阿育王时期的佛陀舍利子，为中国仅有的一颗，很严密地保存于藏经阁内。（佛教徒或历史学家尚未依此说「于（佛灭）百年」推测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年代）

此附会有阿育王山在今浙江宁波鄞县，说西晋武帝太康二年（西元 281 年）有刘萨诃者（后出家法名慧达），于此山中得古代木制佛塔一基，以为阿育王八万四千塔之一，尊崇之，此山遂称为阿育王山。南朝刘宋元嘉十二年（西元 435 年）昙摩密多建立寺塔。梁武帝大同六年（西元 540 年）诏越州守臣萧察重修庙宇，改赐名阿育王寺。

经过考证阿育王时代还没有佛像的雕刻塑造。因为佛圆寂后，信徒们已无法向佛的真身顶礼，只好转向佛的遗骨舍利塔顶礼膜拜。所以，早期只是建造红砖舍利塔供奉，是用来表征佛的真身，佛塔后来就成为僧团的信仰中心；另外阿育王广矗弘法石柱来宣扬教法，石柱也就成为信徒膜拜顶礼的图腾。

《善见律毗婆沙》说：「王所统领，八万四千国土，敕诸国起八万四千大寺，起塔八万四千。王敕诸国造立塔寺，各受王命欢喜而造。」另传说阿育王一时之间能在天竺各地，广造八万四千座佛陀舍利塔的可能性，是在于材料结构及造型都是非常简朴。因为，保存至今的佛陀舍利塔都是用红砖筑砌的，而红砖是取田土造窑烧制即可。阿育王时代，塔的型制是覆钵式，古时候传来中土，被称之为“方坟”或“圆冢”。

○迦膩色迦王建塔

《洛阳伽蓝记》卷五中有杨衒之引《道荣传》所记，于佛涅槃后二百年，迦尼色迦（迦膩色迦）在犍陀罗东南七里所立的“雀离浮图”（cakri stupa，轮王塔寺）：「其高三丈，悉用文石为阶砌栌拱，上构众木，凡十三级。上有铁柱高三百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雀离浮图自往以来，三经大火所烧，国王修之，还复如故。……塔内物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始升，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此塔初成，用真珠为罗网，覆于其上。……」

古天竺覆钵式的佛塔，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向北传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就有了变化，如著名的“佛眼塔”（Swayambhunath stupa，史瓦杨布那特塔）就在覆钵上加上了塔。传到西域，再进入中土，更变得让古天竺人看不出来了。犍陀罗地区的窠堵波就有了变化，其台基增至二到三层，塔身、塔刹相对应缩小。甚至有些地方塔身、塔刹增高了许多，台基部分改为前方后圆。

○天竺珊奇佛、法、僧三塔

佛塔等建筑经「巽加王朝」(Sunga Dynasty)扩建，又经数个世纪后，「笈多王朝」的佛教兴盛期的经营，虽然后来遭受到“伊斯兰教”教徒入侵，塔毁寺损。但近年可从最负盛名的珊奇佛塔呈现出来的雄伟，见到佛教在当时的盛况。

珊奇(Sanchi)又称桑奇、桑志或桑契，距离今印度中央邦(Madhya Pradesh)首府波帕尔(Bhopal)不远的那瓦巴(Nawab)平原的一座高约九十公尺的小山上，是印度的佛教艺术重镇，在众多佛塔皆已荒废后，珊奇大塔是唯一存下最古的佛塔。该地主要三塔与其它遗迹的门柱(Torana, 陀兰纳, 塔门牌坊)、栏楯，雕刻内容丰富，雕工精细生动，有佛教故事、民间神像、圣物崇拜、供养人、药叉女复合幻化的动物以及植物纹饰，展现中印度本土艺术的特色。

佛陀不希望人们称他为神，也不希望人们绘画、雕刻偶像来膜拜他，佛陀遗训要弟子们应该「以法为师」，要遵循他的教法才能解脱。所以后人不敢也不能雕刻佛陀圣像，只好以菩提树(Bodhi-tree)、金刚座、法轮(dharmachakra)、三宝标志(Trishulas)、佛足印、佛塔、弘法柱来代表佛陀真身。因此珊奇佛塔兴建的时期，被称为「没有佛像的佛教艺术」时期。它可以一只小象来暗示“入胎”；一匹马象征“出家”；伞盖和宝座代表佛陀；法轮代表“说法”；塔代表“涅槃”，完全采取象征的手法。

珊奇是阿育王时代中印度的佛教重镇。所以阿育王也在此盖了一座覆钵式红砖舍利塔，塔前立有弘法石柱。珊奇一号「佛塔」很幸运地未被破坏，奇迹似地保存至今，底层台基高4.3公尺，台基直径36.6公尺，其上之塔身直径32公尺，高12.8公尺。阿育王的工匠都是来自北印度犍陀罗的希腊后裔，佛塔旁所雕刻的塔门(Vedika)有十公尺高，石柱成熟精美，像是沿袭罗马的浮雕。后来「巽加时期」在原塔外包砌石块，将原塔加大，四周建低栏楯(Harmika)，栏楯表面的浮雕是简单的动物与莲花饰纹，而「巽加王朝」(Sunga period)那时候中印度的珊奇本土艺人所雕的狮子，看起来就像是只大猫。

珊奇二号塔是法塔，在一号「佛塔」的西方，约建于西元前二世纪的巽加王朝时期。因为考古挖出的四个舍利小盒，内存阿育王时代十位弘法僧的名号，所以称为「法塔」，以别于一号佛塔。此覆钵式法塔没有塔门雕刻，四周只有各式简单的莲花浮雕的栏楯围住，栏楯柱之装饰为圆形和半圆形图案，其中莲花雕纹有全开、花蕾、瓶插等式样。源自埃及的莲花，很早就被“婆罗门教”与佛教作为圣洁的象征，因此在印度任何宗教圣地，处处可见。这座「法塔」也增加了动物的纹饰，除了狮、象、马、牛之外，还有孔雀、竭摩鱼、鸭、蛇等。

珊奇三号塔是僧塔，位在大塔的东北面，因从塔内挖掘出的二个舍利罐，刻有舍利弗与目犍连的法号，所以称为「僧塔」。其规模相同于二号法塔，只是多了一层平头与塔门，但栏楯上之装饰则显得简单多了。印度人相信释迦牟尼是毗湿奴的化身，所以塔门柱刻有毗湿奴神坐在阿难陀龙王上的雕刻。

在主塔之南牌坊的前方，有最早建立的阿育王石柱的残干与柱顶。其它三根分别是「熏迦（巽加）时代」或「笈多时代」所建立的。因此，建筑的形式略有不同。

○早期中国楼阁式的塔及其以后的发展

古天竺覆钵式的塔初入西域及云南时，几乎是照原样搬进来，但与汉地当时已发展高大的木构造宫殿楼（亭）阁相比，在汉人看来不足以供奉伟大的佛陀的舍利与丈六金身。《魏书释老志》记有：「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式样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所以，汉地第一个佛塔—洛阳白马寺塔，可能采取中国建筑楼（亭）阁式与窣堵波的主要外形结合，创造出汉地至今特有的塔。但是也有人以为是将窣堵波的概念，融合了汉代一种军事利用的瞭望台（Watch Tower，斥候塔、瞭敌塔），而发展出来中国形式的佛塔。

“楼（亭）阁式塔”的基座有一或三层的方形基台，也有的是以须弥座为塔基，如约建于隋代仁寿元年（西元 601 年），位于山东的神通寺四门塔。其年代是现存仅次于嵩山嵩岳寺的砖塔的古塔。神通寺原是燕王慕容德为僧朗所立之寺，隋代高僧法瓚奉文帝钦赐舍利至寺，舍利放光，僧俗同见，因此建塔供奉之。此塔仅在须弥基座上立一方形塔身，正中为塔心柱，塔身与塔顶是以石板堆砌而成的，四门内各有石雕佛坐像一尊，面向四方。上披以四坡式方尖钻塔顶，顶上置塔刹，十分古朴。故唐宋以后，基座大多以须弥座出现，塔身改象征六合之六角形、象征八卦之八角形，塔檐由一重增为二重或三重。

《三国志·刘繇传》记说汉末中平五年至初平四年（西元 188-193 年），徐州有位贪暴残忍的地方官（下邳国相）笮融“遂断三军之委输，大起浮图寺”建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彩。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千余人悉课读佛经。……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亿计。」秦始皇、汉武帝都曾修建高楼、台榭以迎仙人，而据僧人说佛又比仙人尊贵，不难想象汉地佛塔，一定要建得比较高崇，故非以楼阁建造不可。

不过，民间的财力是无法与官方相比，一般下层民众就以亭子与窣堵波结合成“亭式塔”。亭式塔一般为单层木构造的圆形、方形或六角形的亭子，亭上加有带相轮的塔刹，这种亭式塔修造容易，所以后来也被许多高僧采用，作为“墓塔”。现存最早的亭式佛塔是山东历城县柳埠村青龙山麓神通寺的四门塔，建于隋大业七年（西元 611 年）。塔身为大块青石砌成，单层方形，每边宽 7.4 公尺，总高 15.04 公尺，四面各开一半圆拱形门，塔室正中为塔心柱，四面各有一佛像。明清以来习称“四门塔”。

宋、辽、金两百多年间，流行一种“花塔”，属楼阁式塔与亭阁式塔融合的塔系，这种装饰繁复的塔被称为“花塔”，因其有如巨型花束盛开，在中国现存有十余座。此系列的塔是在塔身上半部装饰着各种繁复的花饰，如巨大的莲瓣、密排的佛龕或塑造佛、菩萨、天王、力士、神人，以及狮、象、龙、鱼等雕塑和其他雕塑，好比是锦衣缀满了玉石环佩，非常富丽堂皇，是内地塔样华丽发展的结果。

在正定的广慧寺的“花塔”，建于宋金时代，是此类造型中最为繁复华丽的一种。塔为折角八边形之三层建物，仿木楼阁，总高 40.5 公尺，塔刹部分高 13 公尺，十三圈的相轮改以一层层的莲瓣。每一莲瓣影塑有虎、象、狮、龙等动物，或是佛、菩萨，或是小型亭台楼阁，参差配置很有变化，并涂以各种颜色。塔顶则用八角攒尖顶收头，整座塔宛如一束永不雕谢的花柱。现存“花塔”有十余座，比较有名的是敦煌城子花塔、广州六榕寺花塔、河北涞水庆华寺花塔、河北曲阳修德塔、河北正定广惠寺花塔、井陘花塔、北京房山万佛堂花塔、山西太原蒙山花塔、五台山佛光寺杲公禅师塔等。

木料兴建的「楼阁式」塔易燃、易腐，此缺点逐渐被砖石取代，而成为砖石砌建的「密檐式」塔。其塔檐与檐之间的紧密相连，内部空心的塔身被填实，所以称为“密檐式塔”，其密檐可达七级、九级甚至十六级（大理三塔之中塔）。它是在仿亭阁式塔底层之上加上数级塔檐而成。檐与檐之间的塔身高距很近，每面塔身开的窗洞都不大，这是在中国发展出来最有特色的一种塔。

还有一种实心砖塔，每面外表都有佛龕，龕内置佛像，龕之两侧有绘制佛经故事或花纹图案，但求简洁，得与塔体协调，以达朴素大方之效。古代纯砖造的塔，保存至今的如长安（今西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方形角锥状，原十层，因战争毁剩七层，内设有盘梯到顶。）、长安荐福寺的小雁塔（方形，原十五层，因地震影响现存十三层。）、长安兴教寺的玄奘塔、长安香炉寺塔（十三层）、华严寺废墟中的杜顺塔、洛阳白马寺的齐云塔、杭州西湖净慈寺的雷峰塔与保俶塔、天台山国清寺的隋塔、江苏吴县虎丘塔、南京栖霞山寺舍利塔、河南嵩山登封县的嵩岳寺砖塔（十二边形平面，十五层，高约四十于公尺，西元 523 年所建）以及云南大理崇圣寺的三塔（方形密檐式主塔建于西元 824-839 年间，十六层，高 69.3 公尺；两座八角仿楼阁式小塔，十层，高 42.19 公尺，建于西元 938-1254 年间）等等，都是以砖材建造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曾经炸毁了一座砖造斜塔，此塔名泗洲塔，坐落在湖南省武冈县，塔为七级八面角锥型，各级檐下有飞禽走兽、亭台楼阁、花草树木，非常精美。《武冈县志》记有：「泗洲塔.....在东门外」，此塔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元年（西元 1078 年），这座古塔据说倾斜度比义大利的比萨还要老、还要斜。这一炸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人为了这座塔为何斜而不倒而伤脑筋了。

仿木构造的塔是由砖砌，或铁铸或陶烧，可是还保持木构「楼阁式」的样式，每一层仍然砌出木构造的梁、柱、拱、檐等，很清楚地表现出木构造的机能。中国大陆现存有六座古铁塔，其中湖北当阳玉泉山寺，于北宋仁宗嘉佑六年（西元 1061 年）以生铁所铸的玉泉铁塔，重 53.3 公吨，仿木构楼阁式，八角十三层，高有 17.9 公尺；江苏省镇江北固山甘露寺，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西元 1076 年）建有九层高铁塔，明代又修建，将原来的第五、六层作为三、四层，一、二层仍是宋代的制品，塔基为莲花座，配上云水纹、莲瓣双雀、游龙抢珠等图案，十分精致。

以陶烧制的塔，则属西元 1082 年，北宋神宗元丰五年烧制的福州涌泉寺千佛陶塔，最为有名。此陶塔为八角九层，高 6.83 公尺，座径 1.2 公尺，系分层烧制然后并合而成，

形体挺拔纤秀，工艺精巧，仅供观赏。在北京故宫中的寿宁宫尚有六座景泰蓝制成的藏式佛塔，都还镶嵌着价值非凡的猫眼等珍奇宝石。

印度佛教密宗兴起后，又将另外一种五塔式的“金刚宝座塔”传入汉地，早在敦煌北朝壁画中曾出现。但到了明、清时期，才正式有了“金刚宝座塔”的修造。“金刚宝座塔”以方形高台基、曼陀罗坛城式配置五座宝塔形成。其原型来自西元四至六世纪发展出来的一种塔式，最有名的是建在菩提伽耶的佛陀伽耶大塔。正中的塔代表大日如来，北方塔是不空成就如来、东方塔是阿门如来、南方塔是宝生如来、西方塔是阿弥陀如来。

北京有三座“金刚宝座塔”：正觉寺（明代所建真觉寺，又称“五塔寺”，重修于西元1761年）、香山碧云寺塔、西黄寺清净化域（城）塔（为纪念逝于北京的第六世班禅喇嘛，于西元1782年所建的衣冠塔）都属之。其他在山西五台山的圆照寺塔、正定的广慧寺塔、四川龙兴的舍利塔、内蒙呼和浩特市慈灯寺塔、云南昆明的妙湛寺塔、景洪县曼飞龙白塔（九会曼陀罗塔）各有一座，而以五塔寺雕刻得最为精美。

塔的五方配置代表着五种智慧和平面延展的五种佛国世界，还有浩瀚宇宙的象征。喇嘛塔中甚至还包含了日、月、天、空、地等世界的垂直构成，以及地球的地、水、火、风、空等物质原素的特性。如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慈灯寺塔，除了在塔檐塑有佛陀与菩提寺的造型外，在塔座的北边还分别刻有“须弥山分布图”、“天道轮回图”及“天文图”等。天文图中还标有二十八宿、二十四节气等内容。

元代官方信仰“喇嘛教”，从尼泊尔再度将窣堵波传至内地，造型仍似覆钵式，仍保有坟冢的形式，但已不再近似半球体，其下周舒张、中部束缩、上部再鼓大。上面竖立比较长大的塔刹，刹杆拉拔增至十三圈相轮即十三天，有时宝盖装饰繁褥，是为至今仍存有的“喇嘛塔”或“藏密塔”。明清时期密宗照样盛行，但“喇嘛塔”也成为喇嘛或高僧的“墓塔”，在汉地则称为“和尚坟”。

覆钵式塔、金刚宝座塔大致上承袭了天竺旧有的模式，但已加入许多汉地的因素。西元1271年，忽必烈为了迎佛陀舍利，在大都（北京）修建了大圣万安寺，就是尼泊尔工匠阿尼哥设计修造的北京北海妙应寺白塔，与天竺原始的窣堵波并不完全相同。另据〈真觉寺金刚宝座塔碑记〉中说：「其丈尺规矩与中印土之宝座无异也」。

明清时代云南傣族信仰佛教的地区，也有一种与喇嘛塔同宗，但风格不同的“缅寺塔”。缅寺塔大多为圆形或多角形，其塔身低伏而塔刹高耸，相当俊秀。建于西元1204年的曼飞龙白塔，坐落在景洪县孟笼乡曼飞龙后山之巔，傣语称为“塔糯”，意为“笋塔”，看来是金刚宝座塔的一种傣族人所建“缅化”塔的变体。曼飞龙塔为一组九塔立于同一台基的塔群，台基为八角形须弥座。中心主塔为砖构实心，高16.3公尺，周围围绕高十公尺多的八座小塔，塔身洁白，塔尖贴金箔，状似笋之破土而出，造型挺拔秀丽，组合得体壮观。每座子塔都有一座佛龕，内供一尊佛雕，佛龕上还有一只欲腾空飞翔的凤凰，与龕门口两条张牙舞爪的泥塑龙相对成趣。

另外山东历城柳埠村的九顶塔，是建于唐代八角单层砖塔，高 13.3 公尺，塔身是磨砖对缝砌筑，墙体呈内凹曲面，正南面上方有拱门，内置佛像一尊。塔檐部用砖迭涩出挑十七皮，出檐亦随之呈内凹曲面，檐上又迭涩收进十六皮砖，形成八角平台，上方置方形三层小塔九个。中间一个突兀而出，周围八小塔环立，搭配有致，精巧有趣。

塔又有双塔、三塔、六塔及“塔林”等的塔群排列方式。依据《法华经》中所说释迦牟尼佛与多宝如来并坐，故有“双塔”的建立。较有名的双塔有太原的双塔、苏州罗汉院的八角七层双塔、泉州开元寺的八角五层双塔、辽宁北镇崇兴寺双塔等。“三塔”代表尊奉释迦牟尼佛、药师如来佛与未来弥勒佛。大理地区南诏保和时期（西元 824-835 年）建造的大理崇圣寺三塔，是汉地佛塔，其中的千寻塔是大理现存最早的塔，为方形十六层密檐式塔，高 69.13 公尺，旁配有两座十层高完全相同的平面八角形密檐式塔，其高有 42.40 公尺。塔之排列成塔墙的，如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的六塔塔墙、青海塔尔寺的八塔塔墙。

至于塔群成林的，就是元代所建宁夏青铜峡牛首山的塔林，是以三角形布置整齐排列的 108 座塔的塔林，而位于塔林群最上方的是一座覆钵式的喇嘛塔，其造型极为独特。而塔数最多的塔林在嵩山少林寺，少林寺原是北魏孝文帝所建，现有唐代至清代千余年间所造的各式墓塔，共有 232 座。其他塔林如北京西山郊门头沟的潭柘寺及昌平区银山寺塔林、山东泰山灵岩寺塔林等等，都是有名的塔林建筑。

○中国寺塔的特色

中国式的塔有方、有圆，唐以前方形居多，宋以后则有四角、六角、八角以至十二角形，高有三层、五层、七层、九层、十一层、十三层、十五层、十七层以至三十七层者，有实心、有中空，有素砖堆砌甚至雕镂画栋，虽然有些已不再属于宗教的建筑，但的确是一种经由宗教建筑影响的特色。

中国式塔的平面形边通常是呈方或圆，有四、六、八、十二等双的阴偶数，楼层数则为单的阳奇数，完全是配合中土阴阳调合的方式来处理。佛经里有许多数字可以利用，有人认为四边为四圣谛；六角形可以代表六道轮回或六度万行；八边形代表八正道或八相成道；十二边指十二因缘。反正稍能了解佛经又能说善道者，都可以说出一番根据、一种理由。

另据《续高僧传》记载，建于北魏时的洛阳永宁寺塔，完成后几十年就遭火焚毁，后人记曰：「入地刹柱，乃至周年，犹有烟气」。所谓刹柱即“塔心柱”，就是由塔基直贯至塔刹的中心柱。从总高有 32.45 公尺的日本法隆寺现存的木造五层塔设计看来，有学者认为其结构是以刹柱为中心，四周的梁柱再攀附其上。认为刹柱好像是结构上的必要，其实未必，但似乎还有更神奇的意义在内。

○料敌塔与降敌塔

建塔还有特殊的用意，由于建高塔可以远眺四方，利用来作为斥候监视来敌的军事用

途，现存最高达八十四公尺的砖造“料敌塔”，位在今河北定州市，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时（西元 1001 年），历时五十五年才完成。而另外一种象征性降敌用的塔，曾出现在新罗。

新罗国佛教兴盛时期，产生了一种特色，举国将新罗王视为「转轮圣王」，相信新罗王族源至与释尊所出的刹帝利种相同的圣族。慈藏大师于此种风气下提倡「新罗国佛土说」，新罗早是过去佛说法的故地。因此，慈藏曾于护国皇龙寺兴建一座高达六十六公尺半的九层塔，扬言建此塔可以祈愿降服四邻的九敌，塔中纳奉了以前沈湖所带来的佛陀舍利。九个敌国：第一层为日本国，第二层是中华，第三层是吴越，第四层是托罗，第五层是鹰游，第六层是鞞鞞，第七层是丹国，第八层是女狄，第九层是濊貊。新罗国将佛教精神的神髓发挥到极致，佛法就是立国的基本。这是新罗人认定其国是前劫之佛说法故地，也是拥戴转轮圣王的精神指标。

○古塔的代表

砖造塔

《高僧传》曰：「康僧会，吴赤乌十年（西元 247 年）至建康，孙权令求舍利，既得之，权为造塔。晋帝过江更修饰之，此中国造塔始也。」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塔是建于北魏正光四年（西元 523 年），在今河南嵩山的嵩岳寺塔，塔身为浅黄色砖砌造，为十二边十五层的量体，总高达四十多公尺。第一层有四个出入口和八个佛龛，塔内作为置放佛舍利与佛经之用途。二层以上密檐相接，最上是一个砖雕的塔刹。塔的外形为柔合的抛物线状，是北朝时代有着浓厚胡人异国气息的佳作。

据说南北朝时建有一座木造的天明寺塔，高达 147 公尺，相当壮观。另有法王塔建于隋文帝仁寿元年（西元 601 年），位在黑河乱石滩地的仙游寺。法王塔是中国现存唯一的隋代砖塔，为七层楼阁式，高 29.55 公尺，平面方形，塔身笔直，砌筑精细，工艺精良。

应县木塔

而由田和尚奉诏始建于辽代道宗清宁二年，宋仁宗嘉佑元年（西元 1056 年）的“雁塔”，因地处古代之雁门郡所属的应县而通称之，经约一百四十年后，又于金代明昌六年（西元 1195 年）再修建完成，此位在山西省应县程内西北的佛宫寺楼阁式木塔，则是中国现有唯一的古木塔。佛宫寺在金代称为「宝宫禅寺」，占地约有四十余顷，院落群集，建筑非常富丽。但是到了清朝，由于皇帝重视喇嘛教，显较缺少了官方补助，信众又生活穷困，无钱资助寺院，只好让寺院破败荒芜，仅剩此木塔还保持原状。我们可以从塔的南门外木联，明了古人对此古塔的赞赏描述：

第二层 拔地惊天四面云山拱起一柱；
 乘风步月万家烟火飞接云霄。
第三层 俯瞰桑干滚滚波涛紫似带；

遥临恒岳苍苍岫峒屹如屏。

第四层 点岵透云霞西望雁门丹岫小；
玲珑侵碧汉南瞻龙首翠峰低。

此塔原名叫“佛宫寺释迦塔”，为八角形平面木构造塔，五层六檐，底层直径为 30.27 公尺，总高有 67.31 公尺，位在佛宫寺大雄宝殿之前。全塔分为三个结构部分，最下层是砖石垒砌的基台，高四点四公尺；塔身全是木构造，高五十一.三五公尺，有砖制刹座高一点六五公尺；铁制塔刹则高九点九一公尺。（据明万历田蕙《重修应州志》记称，塔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六层八角，上下皆巨木为之，层如楼阁，玲珑宏敞，宇内浮图足称第一。）

全塔不用一根钉子就能建造完成，简直是鬼斧神工。塔的每层结构是斗拱和梁枋组合成的，斗拱有 54 种不同的形式。塔结构的层与层之间不是榫接，而是“叉柱造”，是将上层的柱子下端削尖，直接插入下层柱顶端的凹槽中，此外未作任何固定的措施，就像堆积木一般建成的。每一层柱子都比下面一层向里退入约半个柱径做“收分”，形成柱子向内里倾斜。正由于结构的不稳定性，仿佛有随时倒塌的危险，却是产生位移与形变间相互抵消的安全关键，令今人叹服。还有一个奥秘，更能让现代所谓的结构大师心服口服，就在于木塔除五个明层外，另有四个暗层，各暗层在内柱与内外角柱之间加设不同方向的斜撑，这些斜撑和梁柱所组成的平座暗层结构，类似空间桁架式的一道钢构圈梁，如此明暗刚柔的巧思，使木塔在不稳定中达到稳定，且有极强的抗震能力。因此，虽经九百多年，历经无数次地震，仍旧安然无恙。明代《得修佛宫寺释迦塔记》曾载：「金元迄我明大震凡七，而塔屡震，屹然壁立。」复又历经清代、民国迄今，亦有地震、战火不断，却丝毫无伤，真为古塔庆幸。

○藏传佛教的如来八塔

“藏传佛教”寺塔的种类，有喇嘛塔（天竺式或藏式）、楼阁式塔、密檐式塔、金刚宝座塔（五塔）、朝圣塔、吉祥塔、纪念塔、护庙塔（寺院四周塔）、镇邪塔、功德塔（八座或一百零八座）、长寿塔、藏经塔、舍利塔等多种。塔是佛教一种供信徒崇拜的重要宝物，建塔更有威慑制邪的神圣力量，可供人们祈祷求助。藏族信徒更建造整套的“如来八塔”来纪念佛陀的八大成就。

“如来八塔”也称“善逝八塔”或“八大灵塔”，是“藏传佛教”依“八大制底处”发展出来，为纪念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八大重要事迹，作用类似壁画上的八相图。八塔为：

一·在劫比罗伐史堵的“莲聚塔”（积莲塔、堆莲塔，佛本生处）藏名「贝蚌曲典」，为纪念释迦牟尼佛的降生而建，以佛降世即能行走，步步生莲而名之。

二·在摩揭陀国佛陀伽耶尼连河旁菩提树下的“菩提塔”（Byang chub 成佛处、成道处）藏名「蒋却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觉悟成道而建，也称“成道塔”。

三·在婆罗尼斯国的鹿野苑“吉祥塔”（转法轮处）藏名「札西郭芒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而建，为传法吉祥多门的象征，也称“四谛塔”。

四·在耆闍窟崛山的“神变塔”（现神通处）藏名「炯楚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在

舍卫城显现神变降伏外道而建。

五·在劫比他国的“天降塔”（三十三天塔，从天下处，三道宝阶）藏名「拉霸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升天为母说法后，从忉利天下降重返人间而建，也称“圣降塔”、“降凡塔”（Iha babs）。

六·在摩揭陀国的“息诤塔”（化度分别僧处）藏名「演顿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在竹林精舍调息僧诤，和解不生纠纷而建，也称“和解塔”（和好塔）、“和平塔”。

七·在广严城的“尊胜塔”（思念量处）藏名「南杰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前弟子要求，延长住世、战胜病魔、暂留世间、救度众生而建，也称“胜利塔”、“幸福塔”。

八·在拘尸城城边沙罗林内的“涅槃塔”（佛入涅槃处、双树涅槃处）藏名「酿喋曲典」，纪念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而建。

据说，“如来八塔”的型制就是源自印度获得佛陀舍利的八组人所建的原始窣堵波：“莲聚塔”是依照迦毗罗卫城的窣堵波建造的；“菩提塔”是依照玛格达的窣堵波建造的；“吉祥多门塔”是依照鹿野苑的窣堵波建造的；“神变塔”是依照舍卫城（斯拉瓦斯蒂）的窣堵波建造的；“天降塔”是依照僧伽尸（Samkasya，桑卡斯亚、桑卡西亚）曲女城的窣堵波建造的；“息诤塔”是依照王舍城（拉杰格里）的窣堵波建造的；“尊胜塔”是依照毗舍离的窣堵波建造的；“涅槃塔”是依照拘尸那迦城的窣堵波建造的。

还有另一种无量宫外的八塔：一·东方白顶塔；二·南方多罗宝积塔；三·西方自在三界解脱塔；四·北方业海塔；五·东南象热三塔；六·西南巴尔巴热塔；七·西北吉祥积塔；八·东北日辉塔。

纪念如来的八种塔非常类似，均由台基、塔身、相轮三部分所组成，但为了表示建塔的意义，又有所差异。莲聚塔台基的四个阶层为圆形，上有莲花图案；菩提塔具有降魔的能力，其塔形较大，地位特殊；吉祥塔塔腹要向外凸出；神变塔台基为四方形，塔腹圆凸；天降塔的塔腹又圆又凸，上有天梯；息诤塔台基四层，每层都是等齐的八角形；尊胜塔台基为方形，只有三阶；涅槃塔塔基无层级，是种圆形佛塔。

藏塔有多重的表征，具有印度五大原素的意义，也有宇宙体系的观念。藏塔的基础为四方形，上有四个台阶，象征佛教神圣的须弥山，也属于地轮；塔基上的瓶形塔身是无形的原始佛的位置，象征万物的起源，也属于水轮；瓶上是圆锥体的相论，有十三圈，表示菩萨的十三种果位属于火轮；相轮的半月形与太阳的形状，象征日月星辰围绕须弥山宇宙柱运行着，其月属风轮、日属空轮。因此，藏塔虽有多种的变化，但都不会离开其基本的原理。

印度的窣堵波是从尼泊尔传入西藏，其原来的覆钵半球体转变为瓶形或金刚宝座式的喇嘛塔，而广为流传。更因为元代把“喇嘛教”奉为国教，喇嘛塔便随着政权的扩张出现在中土各地。元世祖至元八年（西元 1271 年）开始，在北京建造落成的大圣寿万安寺，后于明代重建改称为妙应寺，因寺内的这一座白塔，塔体洁白，所以称为“白塔”，如今人们则直称是白塔寺。

这座白塔由元代国师八思巴的得意门生尼泊尔名匠阿尼哥设计建造，共花了八年的时间完成。此塔供奉佛陀的舍利，又作为政教的威权象征而“坐镇都邑”。塔总高 50.9 公尺，基座面积 810 平方公尺，塔基是两层亚字形的须弥座，塔身为上大下小的瓶形覆钵体，钵体下围以大莲华瓣。塔顶是十三层的相轮，装饰着鎏金小铜塔和华丽的流苏，以及重要的标志。

清顺治八年（西元 1651 年），与妙应寺白塔东西对峙的地方，另外建了一座北海白塔，塔基是十字折角型的须弥座，塔体比较清秀瘦高，正面有壶门式焰光门，上刻梵文咒语。塔刹成相背而置的天盘、地盘与日、月、火焰，覆钵下为三道金刚圈。此塔之典雅阴柔与妙应寺白塔之粗犷壮美，形成对比。此塔台基是高大的砖石砌建，上为覆钵式塔身，最大直径 14 公尺，塔总高 35.9 公尺。塔身上部是细长的相轮，刹上的天地盘改为相背而置，再上为日月火焰。覆钵下的装饰由莲瓣改为三道金刚圈。

○西藏高僧灵塔

佛陀并没有要求弟子把自己塑成全身舍利，而是以火化处理。可是后世弟子们却留下那么多的肉身菩萨，代表着何种意义？有没有受到中亚文化的影响？而且干尸、“木乃伊”、和肉身菩萨到底有什么差别？为何佛教徒对干尸不很尊重，却对肉身菩萨要虔诚万分的膜拜？其中如何区别？而且直到今天，仍有许多的出家人期望自己的肉身能够不朽，背后的目的是什么？都是很令人好奇的。

禅宗六祖的肉身舍利是中土最先有的高僧肉身舍利。记载说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密宗大师善无畏圆寂，“遗形渐渐加缩小，黑皮隐隐，骨其露焉”，这是古代密宗大师遗蜕缩身的记录。藏传佛教供奉高僧肉身的灵塔，也就是珍藏西藏圣者的遗骸处。在布达拉宫的红宫内，有历代达赖喇嘛的灵塔；甘丹寺有宗喀巴的灵塔殿；札什伦布寺有第一世达赖喇嘛和四至十世班禅的灵塔殿。

古代埃及和斯基泰人皆相信有来世，认为灵魂不灭，故有厚葬之习俗。根据苏俄的考古研究报告，斯基泰人上层首领人物之尸体，都经过香料涂敷，有些尸体的内脏在涂香料前便取出，尸体除了涂香料外，还放入防腐剂，再填满干果仔，与埃及“木乃伊”的处理方式大致相同。波斯人称斯基泰人为萨迦人，西藏也有萨迦派，也有类似“木乃伊”的处理。而且释迦族与萨迦族，发音相似，与这种情形是否有关？值得研究。

古埃及人相信，人的灵魂有天会回到原来的躯体，并得到永生。希腊「历史之父」曾描述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过程：「首先用铁钩从鼻孔钩出一部分的脑子，然后注入药剂清洗。他们用衣索匹亚石制尖刀，在尸体侧面划一刀，把内脏取出来。用椰子油酒和捣碎的香料清洗体内，然后将桂皮、没药、乳香等众多香料填进体内，再依原样缝好。」五千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是这样保存身体的。

西藏的灵塔与印度的佛塔不一样，它可以在灵塔内供奉火化后的遗骨，也可以保存完好的遗体。高僧涅槃后的遗体要经过防腐、干燥、装金三道技术处理的手续：首先将遗体

加以洗涤，不动一刀一剪地从特殊孔道取出体内脏器，然后用含苏打粉的藏地出产的沼盐，吸收体内的水分，再用绸缎密密裹紧吸出水分，数月间按期更换绸缎，直到水分完全吸干。然后同时以藏红花、檀香粉、香料、漆料、药物及高原地带生长的具有防腐消毒作用的植物等等，进行复杂的处理，使“全身犹如人在睡眠，随时可以唤醒，外部轮廓一如生前”。最后进行装金修饰，先进行整容涂上金粉，并重新描绘五官，并将黄金箔一层层附丽在遗体上，使每一褶皱处都复制得一如生前。然后穿上法衣、头带法冠，手执金刚杵、铃等法器，最后才将制作处理完善的肉身置于塔内。

印度的佛塔纯粹是对精神的关怀，西藏却是把精神与肉体一同珍视。不过，若同样作为涅槃塔，倒以西藏的灵塔最为实际，最符合塔的本义。而且藏塔的塔身合与人体的肩腰比例，也与菩萨的塑像等同，完全呈现禅定中的人体轮廓，所含的深意竟是如此，令人赞服。

○现代密宗建立的舍利塔

第一座在台湾建立的密宗舍利塔，位在台北县深坑乡，是为纪念红教高僧蒋波罗曾仁波切而建，塔身洁白无瑕，衬托在蔚蓝天空的山区里；在台湾台南左镇葛玛葛举寺建有“神变塔”，是东南亚最大的密宗舍利塔。其基座在几位大仁波切的应允下，融合了台湾显密佛教的风俗，作为先人置放骨灰之灵堂；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洛矶山佛法中心，为纪念丘扬聪巴仁波切的舍利塔，是以“天降塔”的方式兴建的，意在祈求聪巴仁波切很快地能转世再来。

丘扬聪巴仁波切在西元 1970 年遇见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Daistz T. Suruki），进而相知相惜，后在铃木先生鼓励下建立了〈金刚法界佛法中心〉。依顶果钦哲仁波切的指示，塔内将放置十万个「擦擦」（Tsa Tsa），这些擦擦是混合了聪巴仁波切的骨肉舍利与泥土所作成的小佛像，通常这样是为了凝聚舍利塔的精神力量。擦擦泥塑浮雕是用硬模挤压而成，可以是小型泥佛或是一些带有佛像的“佛塔小山”。

在印度境内，有一座纪念卡卢仁波切的舍利塔，塔高 108 呎，仅次于圣地菩提迦耶舍利塔的第二大塔，位于印度西利谷利市（Shiliguri）地方，是在通往卡林邦（Kalimpong）、锡金（Sikkim）与不丹（Bhutan）的路上。土地是长住夏威夷的仁青喇嘛的兄长所捐赠。开工时有打雷的吉兆，并挖到五色土。

舍利塔内供有释迦牟尼佛与卡卢仁波切的法像，一块从卡卢仁波切的遗体上割下来的肉舍利，还有一根缠绕咒语代表中脉的直木「搜幸」与很多擦擦（tshs-tsha）。由空中俯视，可以看到塔尖写有斗大的六字大明咒咒语，塔旁四周均立有佛像。（卡卢仁波切的遗体舍利，很完整地保存入龕于他在梭那达本寺的舍利塔）

○现代密宗对佛塔礼敬的无限功德说法

我们从现代的藏密文宣中见到，藏王赤松德贞向莲师请求：「伟大的上师，请您告诉

我们若是向大佛塔顶礼、绕塔、恭敬、献供养以及整修、粉饰、清洁、打扫大佛塔，这是三世诸佛的总集处，这将产生何种功德利益？」莲师回答：「大王，请您仔细倾听。在三世诸佛菩萨皆如实的进入这座清净心坛城后，大佛塔能立即毫不费力地满一切愿，因为它已成为如意宝。如果有众生以清净心向大佛塔顶礼、绕塔、礼敬，所得到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不可计量，这是三世诸佛所不能言。因为大佛塔的建设是为了带给众生无量的欢喜；因为大佛塔是三世诸佛心之无上坛城，因为也是世、出世间众生的欣悦处，不论天人、不论是任何的发愿祈请，一切皆能满愿，即使是究竟悉地和无上成就皆可满愿。」

「这座如意满愿大佛塔——恰容卡秀大佛塔，珍贵的如意宝珠，能赐给众生任何形式的快乐，那些能来朝礼注视大佛塔者，在死亡后中阴飘泊期间，三恶道的门将对其关闭。如果有人能听见大佛塔的音律，究竟证悟的种子已根植于他的心中；如果有人能清楚观想大佛塔本性者，他将不再有种种烦恼的干扰，能很快进入禅定中；如果有人能合掌诚挚地向大佛塔礼敬，将能进入真实道中。」

「有人若希求权势，若向大佛塔献供养，则可成为转轮王；若有人绕行大佛塔，则可获得天道七种功德：出身高贵、形体美好、大安乐、品德智慧、权势荣耀、无有疾病以及长寿；若有人向大佛塔祈愿，则不论为自身求或为他人求，皆可立即满愿；若有人向大佛塔的住持僧众献供养，则来生将无有饥渴疾病；若有人以香花供养大佛塔，则可获得祥和与安乐，以及飞黄腾达和健康长寿；若有人向大佛塔细献香供，则将得到清净的事业；若有人献灯供，则将照亮无明；若有人献涂香，则将远离烦恼与痛苦；若有人供养饮食，则将成就三摩地，并远离饥饿。」

「若有人以五种香来供养大佛塔，将能形体美好、受一切人喜爱；若有人以五种涂香作供养，将得到洁净的住所，无有任何恶味臭息；若有人以五种宝物作供养，则将累积功德，并且增进权势、荣耀、快乐和享受；若有人以宝伞胜利幢作供养，将可免除贪欲，并且将受人礼敬；若有人以丝带和旛旗来作供养，就可得到安乐、财富和丰盛，并且将能免于水、火、狮、象、复仇、毒蛇、非人及毒药的恐惧；若有人以灯烛供养，能在刹那间见到十方如来真实法界；若有人以酥油灯供养，将能以法灯照亮十方，息灭愚痴无明、增广佛慧。」

「若有人以白浆粉刷大佛塔，将得到明洁光润的肤色，并得到快乐、繁荣及健康，并能号令人鬼神众；若有人以饮食在法会中作供养，将能得到究竟和悉地力，而且心识中的各种潜能将成为真实。」

「若有人能扫除清洁大佛塔的灰尘，则能身体明丽光洁；若有人能修护重建大佛塔，则能去除无明的种子和根源；若有人能使大佛塔免于损坏，将能免于非时死亡，若有人向大佛塔祈求大乐之流，将能得到十方诸佛的灌顶加持；如果有人有、无意观想大佛塔，将能自然化生于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中。」好像只要礼敬供养大佛塔，任何「世俗」的富贵、权势都先能满愿。

○多功能的五轮塔

塔之认识有显密二教之别，显教以塔为揭高德之标帜，即所谓“墓标”，故限于佛乃至有德之比丘；密教以塔为大日如来之三昧耶形，五轮塔是佛体，而非墓标，因而允许为结缘追福之利用。故密教可建石塔婆为一般僧俗之墓处，此为五轮塔。《大日经疏》卷十四曰：「一切世界皆是五轮之所依持。世界成时，先从空中而起风，风上起火，火上起水，水上起地。即是曼荼罗安立次第。」

来台弘法多次的密宗大德陈健民上师，曾指示在台湾北部金山乡建立一座石造“护国五轮塔”。密宗用五轮塔来示现十方诸佛法、报、化三身之总集合体，其渊源于《一切如来心全身舍利宝篋陀罗尼经》，经云：「此真言具大威力，能灭生死重罪，成就净善功德，若人至诚礼拜、恭敬、供养，或安于佛像，及塔中，或洁身佩带，心存善念，即为十方如来摄护加持，不为一切寒、热诸病，灾难、天横及盗贼、怨讎、魘魅、咒诅、毒虫、毒兽等之所伤害，亦无饥馑、贫乏之忧，一切诸天赞咏、卫护，速能消除业障，增长福慧，现世安稳，后生极乐，所获功德，不可思议。」

金山五轮塔是经笔者设计，由〈普贤王如来佛教会〉总主教徐博士芹庭大德负责筹款、安排建造，徐总主教说：「五轮塔由下而上为地、水、火、风、空五轮，宇宙皆由此五大元素所组成，其文字则为梵文五轮的种子字，五轮塔中贯以不锈钢管表中脉，由丹麦国王之女婿乌力拉麻哲学博士放置密宗白教大宝法王的发舍利与佛陀舍利。放置后，曾感晴天霹雳，甘露普沾十方之灵验，在场信众皆亲眼目睹。」

五轮塔由下迭上，地轮黄色立方形，水轮白色圆球形，火轮红色正三角锥形，风轮绿色钵钵行形，空轮蓝色摩尼宝形。塔中「贯以中脉」与塔刹的作用是相同的，主要是能通天地之气。《易经》学专家徐博士指出，此五轮塔又隐含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八卦和宇宙万象的原理，包括释、儒、道三教聚集的功德。五轮塔也象征静坐中的人体，作为人体曼陀罗（有胎养作用）：盘坐的双腿为地轮，肾脏为水轮，心脏为火轮，肺脏为风轮，头部为空轮，以让静坐者平衡调心之用。可知，一般塔内之刹柱另有目的，而非属结构上的，但有其必要，是故可从佛教建筑看出佛法的应用性与包容性。

○七宝、轮王七宝与八吉祥、八宝、八供

七宝、八吉祥、八宝、八供等都与佛教的装饰供养有关，常在石雕、彩绘、供桌上出现，我们研究佛建筑必须清楚这些物品。根据资料显示诸经所说的“七宝”有些小差异，《法华经》之〈受记品〉曰：「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无量寿经》上就树说七宝：「金、银、琉璃、玻梨、珊瑚、砗磲、玛瑙。」《大智度论》卷十曰：「有七种宝，金、银、毗琉璃、颇梨、车渠、马瑙、赤真珠（此珠极贵，非是珊瑚）」《阿弥陀经》曰：「亦以金 Suvarya、银 Rupya、琉璃 Vaidurya、玻梨 Sphatika、赤珠 Rohita-mukta、砗磲 Musara-galva、玛瑙 Asmagarbha 而严饰之。」

《般若经》则以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为七宝。而蒙古“藏传佛教”的七宝（资具七宝）则为金、银、琉璃、冰珠石、子母绿宝石、水晶石、红珍珠。今人选

其中不同的八种称为“八宝”。通常“藏传佛教”雕塑的佛像体内或小型塔中装藏用的“五宝”，为金、银、珍珠、珊瑚、青金石或水晶。不过，也有把剑、虎皮、坐席、八功德水、衣服、靴、佛堂等称为七宝，所以不要混淆不清。

《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修行经〉提到：「一. 金轮宝、二. 白象宝、三. 紺马宝、四. 神珠（摩尼）宝、五. 玉女宝、六. 居士宝、七. 主兵宝。」其中居士宝在《涅槃》、《俱舍论》称为“主藏臣宝”，在《杂譬喻经》则为“典财宝”；又有居士宝另称为“大主臣宝”，主兵宝另称为“将军宝”的说法。藏族佛画中的“七珍”宝（precious）为大象宝（elephant）、大臣宝（minister）、王后宝（queen）、骏马宝（horse）、将军宝（general）、金轮宝（wheel）、牟尼宝（jewel）。甚或增加宝藏瓶、宝山、宝树、宝牛等等，这些都是指转轮圣王所应该拥有的宝物。

“藏传佛教”的吉祥物甚多，其中以呈现图案之“八吉祥”为最常见。八吉祥为：吉祥宝伞（Precious Umbrella）、吉祥金鱼（Golden Fish 双鱼）、吉祥宝瓶（Vase of Treasure）、吉祥莲华（Lotus Flower）、吉祥海螺（White Conch）、吉祥宝结（Endless Knot, 盘长）、吉祥宝幢（Victory Banner, 华盖——天竺军旗）、吉祥法轮（Golden Wheel）。而蒙古“藏传佛教”的“吉祥八物”却是指：镜子、黄色颜料、奶酪、酱、羽毛、水果、右旋海螺、红色颜料等。西藏的“八瑞物”也称“八吉祥物”，则为：镜、酪、长寿茅草、木瓜、右旋海螺、牛黄、黄丹、白芥子。还有“八宝饰”（Eight jewel ornaments）是装饰佛像的物件：头冠（crown）、耳环（earrings）、高紧领项链（choker）或短项链（short necklace）、长项链（long necklace）、臂环（arm rings）、手镯（bracelets）、脚镯（anklets）、皮带（belt）。

“藏传佛教”的“八供”是供在供桌上的礼品，其咒为喻边炸（金刚加持）啞甘（饮水——表功德水）、巴丁（浴水——表功德水）、补施别（花——表布施）、堵别（香——表持戒）、啞罗给（灯——表忍辱）、更迭（涂香——表精进）、尼尾爹（食物——表禅定）、夏布打（音乐——表般若）不啰的匝耶（虔诚奉献）娑哈。所以，如果不是实品供养，则会绘画在彩图上，那是表示虔诚的一点心意。

○为何早期的佛塔摆在中轴线上？

据《洛阳伽蓝记·永宁寺》说：「前有寺门，门内建塔，塔后建佛殿。」塔中藏有舍利，是信徒膜拜的地方，为寺院的主体，塔重于寺，今日本大阪飞鸟寺与四大天王殿是仿白马寺而建立，从韩、日两国现存的古佛寺，约略可见唐以前中国佛塔的风貌。

位在五台山南门道上附近的尊胜寺，现已非唐代原貌，早先是佛陀波利第二次回五台山经过，于此见原寺已毁，表奏圣上奉旨敕建为“善住阁院”并建有尊胜经幢，“经幢”是刻有经文的多角形石柱，该经幢现已无存。此寺于宋大圣四年（西元 1026 年）演教大师奉旨重修重建，再建有尊胜经幢，改称“真容禅院”；又于明万历十九年（西元 1592 年）淳峰和尚承旨修建，寺名改为“尊胜禅寺”，但大致上应该仍依原有之中轴线建立。

西元 1986 年香港的金山法师见祖庭破败，集资重修，历十二年完工。今之尊胜寺从入口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三大士殿、藏经楼、诸天殿与五文殊殿皆对准中轴线建立的，寺后建有高四十五公尺高九层的万藏塔，则稍微偏些。左手边念佛堂前的中庭，现存有的塔形尊胜经幢，系宋代建立至今，有些风化，但经文仍很清晰。寺右侧墙外，则有墓塔群。

戊寅年末举办「1998 年佛教建筑传统与前瞻系列讲座」，第一节中国中央美术学院屠舜耕教授特别提到，初期的佛教建筑在寺中心大殿前，均建有佛塔，后来逐渐塔寺并重，再后来则寺重于塔，塔就往两侧移，退居次要地位，最后却缩小供于供桌上，改以供佛像的大殿为主体。起因是佛教信仰深植民间后，随着对佛理的认知，人们开始摆脱佛塔的神秘感。

而据《沙门统惠深之条制启》曰：「朝士死后，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宅略为寺矣。」北魏开始，一般富绅仕豪为求死后得度或来世平安，纷纷献宅为寺，但依制“宅居佛寺”是不能建塔的，只好成立无塔之寺院，从此开始塔寺分离。

建于南朝元嘉二年（西元 425 年），位在宁波的阿育王寺中，有一座舍利殿高五十余（公？）尺，殿内再建一石制舍利塔，石塔内又有一小座七宝镶嵌的青色木塔，“高一尺四寸，广七寸”，塔刹有五重相轮，塔身四面都有雕刻，内藏有释迦牟尼佛的舍利。此小木塔完全是印度风格的造型，据说是在晋代泰始年间（西元 265-289 年）由叫刘萨阿的人挖掘出来的，被视为阿育王所造的八万四千塔之一，但又与五代吴越王钱弘（俶）以金铜精钢所造的八万四千宝篋印经塔相似，根本弄不清楚到底是地下挖出来的，还是五代时遗传下来的。不过，确是中国现存最小的名塔。

○塔为何成了死亡的象征？

在屠教授所展示的幻灯片中，有些塔的塔刹就现出了八卦的符号，中国佛教认为如此佛道不分，更成了台湾寺庙的特色。古代的塔是佛陀神圣的象征，台湾佛教并没有类似大陆的丛林制度，没有寺田供给经济来源，不知从何时开始，就有了“灵骨塔”、“骨灰塔”来安奉信徒灵骨，成为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屠教授就说中国的古佛塔很多是实心的，最多也只是一楼才可以进入，里面供的是佛陀舍利、佛像、佛经等。

其实中国佛教除佛塔外，还有两种不同功能的塔，一是“墓塔”，一是“风水塔”。“墓塔”是用来埋藏高僧和佛教徒的，大多离佛寺不远，造型与窣堵波式塔相似，但也有「亭阁式」塔与「密檐式」塔，“墓塔”下筑有石室，内可置骨灰罐，以千百不计等。中国大陆于最近几年，又有由港、台信徒投资灵骨塔、骨灰塔的兴建。

约在元代中后期出现的“风水塔”，是堪舆家利用佛塔建筑，作为弥补风水缺陷所用，或为镇风、镇水、镇妖而建，一般采用「密檐式」塔，量体不大而简单。不过，到了清朝中晚期，则又有属于“风水塔”的「圆柱式」塔出现，其基座为方型，塔身平面则为圆形。而塔檐收分不很明显，檐级的出伸很短，每层塔檐用石料仿砖塔正反迭涩出挑，且其规模

不大，仅只有三至四公尺高。后期“风水塔”亦以实心居多，装饰也比较简单，每面塔身劈龕，置以道教之造像，如魁星、文曲、雷公、老君等等。

明末清初时的见月老人在《一梦漫言》书中提到：塔应建在龙首之地，以保永远。也就是要建在大殿左前方，中土人士认为主殿左边为大，若是建佛陀圣塔，当然可望佛寺香火兴隆。后来却有人主张塔不宜建在大殿前方及两侧，想必指的是灵骨塔、骨灰塔才有了此禁忌。于是可知有学者为何认为塔是「死亡的象征」，指出建于埔里的中台禅寺在佛头顶上安塔是「死亡的建筑」，是不吉利的。

○绕塔是修行？

又《佛音日报》曾报导，佛光山星云大师准备花上新台币十亿元兴建佛「牙」塔，安奉由逃亡印度的西藏喇嘛所赠送，迎请回来的佛牙（但并未说明是左犬牙或是右犬牙，人类只有四颗「牙」，佛陀其它三十六颗应属「齿」），而委托高雄一位「民间专家」（非建筑师）规画。过几年塔兴建完成以后，台湾将有一处作为膜拜、绕塔修行的圣地。因为台湾的塔都是安奉寺僧或俗人的灵骨塔，没有一座纯舍利塔之故。

再根据〈佛文月刊〉报导，星云大师最后则决定在佛光山寺的北侧，开发九点六八公顷土地，利用五点四公顷可建地，兴建地下一层、地上二十层建筑物，作为「佛陀纪念馆」，内设佛牙舍利展示区、藏经区、小型展览纪念馆、禅室、研究室等。后来佛光山在世界不景气的当今，又取得擎天神公司抛售的西北侧邻地四十公顷的土地。

中国时报终于在 2003 年 1 月 13 日报导：占地五十公顷的佛陀纪念馆，在 12 日动工。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表示，纪念馆的外观是以「初看不是佛，看久了就是佛。」的宝塔造型设计，宣称与高雄县政府未来推动的「观光行销」目标一致。纪念馆的建设，和高铁、捷运有着同样得意义，后者是「硬体」建设，纪念馆则属于「精神」建设。

更表示此座塔高一百三十公尺的「佛陀纪念馆」，只要除了供奉释迦牟尼佛的牙齿舍利外，馆内还有博物馆、展览馆，并设有三百六十度立体动画电影院、活动广场、文化广场、服务广场、安养中心等附属设施。塔的建筑材料是当今最特殊的建材，将可留存数千年，可以是未来世界历史的杰作，是作为全世界人类的精神指标与堡垒。安基仪式则在念佛、洒净及七百位贵宾虔诚捧着以金箔包覆的砖块，依然在齐念着「阿弥陀佛」的圣号下砌成。

其实，绕塔的宗教行动，自古就被认为是有加持力，能够赐福信徒的。虽然，整个外在的身体的朝拜行动，是由个人内心深处转化的，何不直指出来，是否智愚程度不一，必须统一教学？或许是为了同时减去现代信徒因过度营养后的肥胖，而令朝山绕塔，却忽视思维敏锐的小部分人。

相信不少人曾见《达摩破相论》说：「绕塔行道者，塔是身心，当令觉慧巡绕身心，念念不停，名为绕塔。过去诸圣皆行此道，得至涅槃。今世人不会此理，不曾内行，唯执

外求，将质碍身，绕世间塔，日夜走骤，徒自疲劳。」可知绕塔是「像法佛教」甚至是「末法佛教」的特色。正因有如此等超然之见，达摩大师（Bodhi dharma）早就受到顽固的密宗与律宗法师的毒害多次。但是，如今号称传临济禅法的大师们，却漠视达摩祖师的劝告，真令人摇头叹息。

佛像部分

我们可以把佛、菩萨、阿罗汉、金刚、四大天王、护法神众、历代祖师、飞天（Gandharva，音乐神干达婆）等等的神像（deities）绘画、雕塑都归为“佛像艺术”。传遍亚洲的佛教，因为在西元前二世纪左右受到希腊文化的促成，人们从心灵崇拜（理性的信仰）转变为膜拜偶像（感性的信仰）的信仰，逐渐转变为众佛、众神足下虔诚的信徒，已经有将近二千年的历史。

佛像崇拜的信仰已经根深柢固，不会再有人习惯于没有佛像的原始佛教，就连提倡“回归佛陀时代”的人，恐怕也不能避免放弃佛像的。因此，佛像已成为佛教精神的直接表征，但是如果把佛像在各传播地的发展情形作一系列的比较，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现象，还会让人有“这怎么可能？”的怀疑与惊叹。

○为什么早期的佛长得像希腊人？

目前所知，据传由富楼那尊者为佛陀所画的写实像，仍存在大英博物馆中。该画与“婆罗门教”对梵天印象既成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的描述，的确相差太多（但如腋下平满、马阴藏相等修气功行者所产生的生理变化后之特征，确有其事实。）。依此传说的大人相——大丈夫相，本就属于占星命相上的说法，如果全部依该说法，所描绘出来的佛像，一定相当奇怪的。

「贵霜王朝」把佛陀改造成印度化的阿波罗（Apollo）的样子，有着波状毛发，那只是泛希腊化地区的佛陀，就连后来世界各国自行雕塑的佛像，也全然不同。而非洲黑人基督徒就曾把耶稣塑造成黑皮肤形象，以便让同胞认同，这真是异曲同工。清乾隆六年，为了中国佛像还是大量的粗制滥造，便下令译出《佛说造像度量经》以统一佛、菩萨、佛母、明王的造形。（当然这本经是后代大德造，非释迦佛亲说。）

今“小乘佛教”寺院中仅以单尊「取相」，仅提供以一尊释迦牟尼像来敬拜，甚为简洁，确与“大乘佛教”、“密乘佛教”有其不同、特殊之处。可惜全国制式的统一造型，却又显得十分呆板，如缅甸、寮国等国家的佛像造型。古希腊是偶像崇拜最彻底的国度，希腊人一定受到古埃及偶像崇拜的熏陶，其「拟人化」的神像，留传至今最多，当然对印度古有宗教变成偶像崇拜影响也最大。

希腊佛教不能免俗，为了大众冥想的需要，所以也在希腊入侵印度犍陀罗（Gandhara）后，并同时于摩突罗（秣菟罗 Mathura、摩偷罗、马图拉、末土罗、摩突罗，今穆特拉）分别有了大量佛教与“耆那教”的造像运动，并使在家佛教徒视具体之「事物」重于抽象之「理论」，但将本来主张「觉悟」的修行，忽然降为偶像崇拜，陷入与佛法相违的巨大矛盾与倒错的危险中，则甚是可惜！

○原先佛像是被雕刻来模仿、思念用的，不是用来拜的。

如今我们用金、银、铜、木、石，雕塑了佛像，每天很虔诚地跪拜，是想能崇服佛的般若智慧，见了祂的形像，不忘祂的教诲，是为了「模仿、效法」祂的行止，或如同看了父母的遗像，回忆父母的亲情，在内心中与父母有交谈的机会，此种祷告的心怀，也是各教信徒相类似之处。又，供花献佛正如同我们以花圈装饰在阵亡将士铜像前一样，是在感佩其崇高精神，而不是求那些金银物像的神秘加持。若说佛像必须享用供物，岂不会把信徒吓死？

所谓「祭神如神在」那是假设的状况，如果拜石头会感应，有神秘的灵效，也都是自心的反映而已，没有神奇可言。所以《金刚经》（Diamond Sutra）警告说：「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即能显现出我们如所从来（So-come）的佛性，才是最需要去了解的。否则又被痛责为偶像崇拜（基督教也有十字架的象征性图腾崇拜），岂不冤枉？

事实上“汉传佛教”崇拜佛像的起因，正好是中国在“五胡十六国”三百多年的分裂战争动荡下，人民苦难深重。佛教适时宣扬救苦救难的伟力与因果报应的说法，吸引了大量受苦受难的人民，和已自身难保的上层人士，而大为兴盛。西域式的佛陀梵像进入中土便迎合变装，于是汉相的佛、菩萨像高坐于华美的床上，上覆七宝流苏帐，宛如中国的帝王、王公、贵族。但背后却隐藏着“帝王即佛”的用意。也由于「政教合一」的需要，让大师们不敢怀疑，至今中国的信众们却仍然迷惑于这种祈求、崇拜。

○佛教徒不应该着像迷信

您曾否怀疑：「我家的『欧米陀浮』和你家的『阿弥达罢』为何长得不一样？」尤其今日可见日本、中国、台湾、西藏、尼泊尔、锡金等地所造佛像，虽都有阿弥陀佛，竟然没有一尊造型相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着相，否则执着外像修法就是「外道」法，尤其不要忘了内寻、内证的心法。可是往生时来接引的是谁？岂不叫人有盲目无主之憾？

因此，要知道所谓阿弥陀是无量光，是要在脑中生起无量寿、无量光才对。记得十年前有人在台湾南部佛×山拍照时，因为长期曝光及动摇的缘故，洗出烛光摇曳的呆板照片，一时轰动号称西方三圣显灵，到处被传颂着。还有很多附佛外道，利用重复曝光制造重迭显像，更笨拙的是指头挡到，洗出来后却大肆宣传为放光加持、神佛降临，达到种种自我宣传的目的。对于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大师想澄清清楚。

佛教徒的着像迷信是目前最被“基督教”徒引以为笑谈的，拥有般若智慧的佛教沦落

至此，能不叫人感慨万万千？（依古大师指示：接引佛具不定相，皆凭信徒感知，但应具无见顶光、须弥白毫眉间光、胸万卍字（Swastika）旋光。此指示亦提到是光的觉受，故非世间尤其在中国创立的净土宗，诸大师所推崇之各种艺师画作的画像、塑像而已。）

○密教徒应该是模仿的高手

后来，「后期密教」虽开始出现庞大的造像，如果不了解其「表征」的用意，更会陷入着相的泥沼，或沉迷在满天神佛的幻境。俗称「禅贫、富密、净土方便」由于密法成立之年代，是当时「物质」文明盛兴的时代。社会人士知识水准「好像」也较高，强调今世要能成就，比较适合（各当时）的知识阶级、智慧高、家境良好者。加上有理论智慧、有程序的修法，其供养物品，可显示当时的富裕。而密教为了将深奥的密法，以各种特殊造像来「表征」，然后再详细解说，并告诫应于「最终」而放弃、离执而无执，显然是针对当时、当地人心、文明之不同而设计，此真是用心良苦！

密宗训练先由「对生本尊」崇拜，转成最终之「自生本尊」观想，从唐卡（Tanga, Thank-kas 荡嘉）上绘制的佛像等造型、坐姿来「模仿」起，在身心上达到相同的境界，是「以假修真」最圆满的教学方式，暂时允许初学者对偶像「崇拜」的用意也是在此。尤其观想其实也是一种能量波动，想念光明的方法，这也是密教的特色。但是误用于黑暗的观想，就会降低能量波的波长与频率，而贬低陷入黑暗的空间——所谓的「地狱」。

但是，如果学了太多本尊以后，难免变成多重性格，增加自己的限囿，发展自己的执着与对他人的憎恨，反而不利心性的超越。《西藏的魔法与密法 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书中描写一群人可以虚构一个幽灵（心灵的产物），大量的心能量凝聚，而且赋予它生命，但要费很大的工夫，才能重新吸收将它「解体」。由此可知，虽然掌握了「心灵造物论」，若是一直执着崇拜佛像和曼陀罗，仍无法领悟佛的正心。

尤其，密教金刚明王的产生来自印度教的诸神，是以作为比湿婆夫妻更具威力的神佛而创造出来的。密教「认为」不动明王是大日如来的化身；降三世明王是阿门如来的化身；军荼利明王是宝生如来的化身；大威德明王是无量寿如来的化身；金刚夜叉明王是不空成就如来的化身，完全是随顺刚强众生而幻化出来的，所谓「菩萨低眉；金刚怒目」两者相应并俱。还有密教的诸天像，也是由“印度教”及其他宗教的神，转化而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众。

在《大圆觉心法》一书中，华藏上师指出密教则是初期祖师为对治“婆罗门教”徒而设立的，龙猛菩萨住世时，则以婆罗门之手法建立一切密法，即用婆罗门方法度婆罗门，使之还归本来面目。一切的知识如果没有善加运用，很可能成为我人达到自性最深奥境界的陷阱。因为观照自己，不必依赖正式的灌顶仪式，也不依赖知识的诠释。

其后诸师均依龙猛之法，建立四本续以度印度四阶级：以《修本续》度婆罗门（Brahmana，祭司）；以《作本续》度刹帝利（Ksatriya，王室、武士）；以《瑜伽本续》度首陀罗（Sudra，农奴）；以《无上本续》度旃陀罗（Candala，屠者）。对贪、瞋、痴

特别重的人，分别顺其性而编制不同的仪轨来对治，常听：「我有一切心，佛说一切法；我无一切心，不用一切法。」即知其详。

因此，不要忘了成佛只是觉悟实相的道理而已，而不是要修成（着相）为纸画、泥塑、石雕、木刻、金铸成品模样，也不该冀望物体偶像能赐福给我们。禅宗强调：「佛来佛斩，魔来魔斩！」就是深刻了解自心的反射，形成一切的圣凡意境，不可执着。

若说中国行者念佛，会出现中国式的佛像；那么泰国信徒脑中出现的，一定是泰国的佛像，两者绝不会混淆。因此念佛现出佛像的情形，也只表示对佛像虔诚专心而已，不值得夸耀。《金刚经》不是告诫我们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吗？

○佛像塑造的起源

周显王 42 年（西元前 327 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希腊、罗马、埃及，并入侵本属波斯的犍陀罗（Gandhara，今属巴基斯坦 Pakistan 和辛得 Sind），将西方的偶像崇拜文化带入此区。直到西元 50 年，后汉光武帝建武 26 年，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于罽宾（Kubha，古印度西北地区，今之阿富汗东北与东巴基斯坦北部）建立北印度「贵霜王朝」。西元 58 年，丘就却登位第八年，开始采用“佛教政治”治国，建立「阿育王僧伽蓝」，召开大乘经论结集大会结集初期大乘经论，初期大乘崛起，此亦即传统佛教史上所称“第三次佛经结集”，也为贵霜王朝第一次佛经结集。

丘就却登位第十年，建「阿育王僧伽蓝」，诏令天下立「如来神庙」，并戒杀，戒猎与捕鱼，推行孝道。西元 62 年，丘就却登位第十二年，将「班央石窟」赐给“耆那教”生活派僧人居住，在佛陀诞生地竖立石柱及佛像，并下令佛出生地的「蓝毗尼」村人得以减税，下诏每五年将由中央派佛教官员至全国各地视察佛教政治推行情形。

早期原始佛教不允许描绘或雕塑佛陀在人间的肉身像，人们仅能利用象征性的事物来怀念佛陀的曾经存在，人们非常苦闷于无法对佛陀的敬慕。直到西元一至三世纪，才逐渐打破了这种禁忌，开始发展成为佛像雕塑艺术的兴盛时期。在古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与北部的秣菟罗地区，曾是「贵霜王朝」时期的两大佛像雕塑中心。另外在中南印度的「案达罗王朝」（Andhars Dynasty）统治下的阿默拉沃蒂地区，其佛像雕塑的手法自成一派，与犍陀罗、秣菟罗形成该时期的三大艺术重镇。

希腊人本就具有诸神的神话与造像的意识，很容易就打破印度次大陆原本回避塑造佛像来崇拜的禁忌。于是古埃及的摩崖王像，希腊、罗马的神像雕刻等巨像传统，加上波斯艺术的装饰图形，被希腊裔佛教徒引入天竺地区。因此在“大乘佛教”的发展地，从此开始有了佛教的偶像崇拜。这种希腊化的罗马艺术风格和造像术，便流行于中东与天竺等地区，而基督圣像的造型似乎也是如此产生的。

初期为了以佛陀为修行榜样，曾经雕塑佛陀苦修时的瘦骨像以及佛陀的涅槃卧像，普

遍显示出当时的宗教气氛和苦行的坚持。佛头有着优美自然的波浪式的卷发覆盖，披希腊通肩式的长袍袈裟，脸部表情高贵、冷静，神态是安然般沉思内省。

○佛像艺术的发展

自从西元一世纪开始塑造佛像以后，任何一个时期，只要人心的愿求有所变迁，佛教的思想也随顺众生产生变迁，通常都会表现在当时佛像的雕塑造型上，反应出当时当地人心的祈愿目的。所以从考证佛像、观赏佛像中，可以在形的变化发现隐藏于背后的思想演变，了解当时信徒们心中的变化与愿望。

随着佛教的兴盛，中土地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佛像的绘画与雕塑，便得到空前的发展。凡有寺庙之处，都有画家、雕塑家投入心血，创造精美的佛教艺术品遗留至今。常见的经变图，有佛陀的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佛说法图、因缘故事、佛教史迹等等，各有主题。都随着不同的民族、朝代、政权，以及不同的技巧、手法与造型，留存各种艺术创作，形成蓬勃的佛教文化。

武则天时，有于阗僧人提云般若译（或编）出《佛说大乘造像功德经》说：「依诸相好而作佛像，功德广大无量无边不可称数。弥勒，若有人以众杂彩而为缋饰，或复镕铸金、银、铜、铁、铅、锡等物，或有雕刻栴檀香等，或复杂以真珠、螺贝、绵绣织成，丹土、白灰若泥若木如是等物，随其力分而作佛像，乃至极小如一指大，能令见者知是尊容，其人福报我今当说。」这是最澈底的「像法」时代之经典名著。

在印度等地的佛像，大都偏向描述佛陀的本生故事，目的不外是要世人效法佛陀，佛手则作出说法或转法轮的手印。但是，在中、韩、日的佛像造型让世人效法的少，信仰祈愿的却到处都是。寺中虽有应信徒需要的多尊佛像，却以主尊单独的坐像、立像为多，佛手则呈现与愿手印或施无畏印居多。可知中土佛教思想的传入，是以当时的民族思想特性加以选择后传入。那么，由输入再输出到韩国、日本的过程中，从佛像造型的不同变化，也可以了解各当时韩、日两国的国情与民心的特性。

初传期的韩国佛像是禅定印像，一般认为是以释迦牟尼像为学习对象。六世纪末至七世纪中叶，则盛行弥勒菩萨的思维像，与新罗国自称「龙华香徒」的花郎集团，抱着出世济众，追求统一志业，建立理想国有关。统一新罗时代汉三国时代相同，仍以阿弥陀如来、药师如来、弥勒菩萨、观音菩萨为主流。三国时期王族阶层普遍信仰弥勒，但是到统一期以后则不分阶层，群众则以信仰阿弥陀佛净土为主流。

再从日本佛像造型的演变，也可以看出各时代社会人心的变化与愿求，及佛像的深入涵意和各种表法。如阿弥陀佛，在「奈良时代」，是以说法的姿态表现；「平安时代」则以静坐沉思的姿态表现；「鎌仓时代」以后，天下不平静，则以立像作为接引的姿态。国民党政府播迁来台湾以后，由于经过长期的战乱，人们厌倦娑婆世界的不安，于是产生净土思想中祈愿往生的迫切愿望，所以一些寺院还把接引佛像沿着马路，在露天下一尊尊地排放，成为台湾佛教的特色。

○巨佛的创建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写今阿富汗境内的巴米扬石窟说：「梵衍那国……王城东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五十尺，金色晃曜，宝饰灿烂。东有伽蓝，此国先王之所建也。伽蓝东有包覆金俞石箔（tuttha，黄铜，色如黄金）的释迦佛石雕立像，高百余尺，分身别铸，总合成立。城东二、三里伽蓝中有佛入涅槃卧像，长一千余尺。其王每设无遮大会，上自妻子，下自国珍，府库既倾，复以身施。群官僚佐，就僧赎回。若此者以为所务矣。」（看来梁武帝还不是率先舍身入寺的榜样）

巴米扬石窟位于今阿富汗喀布尔城西北方二百公里，是在北面兴都库什山（Mt. Hindu Kush）的一条支脉货贾加尔山脉与南面是巴巴山脉之间，位在此两山脉间的一个小盆地上，此处是古丝路中亚地段连接萨珊王朝、印度和西域的交通枢纽。巴米扬大佛窟群有 750 多个洞窟，分布在海拔 2500 公尺上的山崖，有两座大佛高达 55 公尺和 38 公尺，分列于东、西两侧岩壁，两壁龛相距约八百公尺，整区共构出庄严、肃穆的圣地，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遗址之一”的石窟。

而金佛在八世纪至九世纪时，被入侵的伊斯兰教徒剥去颜面。十三世纪时，蒙古大军把梵衍那城塞的人斩尽杀绝，从此此地被人称为“死谷”、“鬼都”。今据考古学家与学者所了解，据说在距离两站立佛像不远处，真的有一尊卧佛，因为埋藏在地底或藏身山壁间，而逃过回教徒毁坏佛像的劫难。此卧佛是那两尊立佛的四到五倍大，长有两百多公尺。从玄奘大师的描述，知道雕刻的是涅槃的佛陀卧像。西元 2001 年年初阿富汗神学士政权的塔立班在摧毁巴米扬两大立佛及石窟后，被世界各国视为极端回教激进份子。于该年 11 月 15 日包庇恐怖份子主谋奥萨玛宾拉丹的阿富汗神学士政权，在美、英联军轰炸下撤出喀布尔，换由北方联盟进入，但仍属回教信仰者。因此是否让卧佛出土，已成为争议的焦点。

这种巨佛造型随着佛教东传及南传，受到中土和南洋帝王的仿效，中国著名的有北魏云冈的“昙曜五窟”本尊像，敦煌莫高窟 33 公尺的北大佛和 26 公尺的南大佛，甘肃天水麦积山高 15.7 公尺的摩崖大佛释迦牟尼和普贤、文殊两菩萨像，陕西彬县石窟高 18.5 公尺的本尊佛像，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卢遮那，流舍那，法身佛毗卢遮那 Vairocana 的报身）像，四川乐山高 71 公尺、肩宽 24 公尺的凌云山石刻弥勒大佛；四川潼南县高 27 公尺的南禅寺大佛。

巨佛的创建传到日本，有名的是鎌仓大佛和奈良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像；传到柬埔寨时，阇耶跋摩七世建新王都，称为大吴哥城（Angkor Thom），其百因寺由 54 座大大小小的宝塔构成一座大宝塔，高约 43 公尺，每座宝塔的尖端皆雕有四面微笑的佛陀面孔，被称为「高棉的微笑」。这 216 张佛陀面孔其实都有阇耶跋摩七世的影子，用于代表至高无上的王权。

在唐代武则天更执意将卢舍那大佛的造像变成自己的化身（或者是朝臣的有意奉承

），那么两侧的天王菩萨就是她的群臣。藉以寄寓王权的永握、江山万世的祈愿。武则天建周以前，观音的造像还留有胡须，她当权以后，观音才特别「应化」成为女性，让今天大部分信徒以为观音本来就是女性。

○大月氏国的佛像艺术

佛灭六百多年后，丘就却时代（生平西元前5年到西元78年，在位约同东汉光武帝时代）才出现的《道行般若经》说：「譬如佛般涅槃后，有人作佛形像，人见佛像无不跪拜供养者，其像端正姝好如佛无异，人见莫不称叹，莫不持华香、绘彩供养者。」

《般舟三昧经》说：「佛者色如金光，身有三十二相，一相有百福功德，端正如天金成作。过去佛，当来佛，悉豫自归。今现在佛，皆于人中最尊，常念供养，当供养于佛华香捣香饭食具足，当持善意，用是故，三昧离不远。常持鼓乐倡伎，乐于佛心。为求是三昧者，当作佛像，种种具足，种种姝好，面目如金光。」（可见《道行般若经》是配合造像才造作的经典）

丘就却时代的人民，在官方的鼓励下，非常热衷于立塔及造佛像。大乘经典之《佛说作佛形像经》更列了十种作佛像的好处，并说：「作佛形像后世得福无有穷极尽时不可复称数。四天下江海水十倍……作佛形像，后世死不复更泥犁禽兽薛荔恶道中生。其人见佛形像以慈心叉手，自归于佛塔舍利者，死后百劫不复入泥犁禽兽薛荔恶中。死即生（升）天，天上寿尽复来下生为富家作子，珍宝奇物不可胜数，然后会当得佛泥洹处。」告诉民众如此则可以有「得福」、「作大功德」，后世能享尽容荣华富贵的妙用。（这岂是佛说之本意？）

「贵霜王朝」曾采取宗教宽容的态度，使得文化呈现出多元的风貌。其钱币上除了佛像外，还采用希腊、波斯与印度各地三十多位神祇之像，如“拜火教”的太阳神（Mithras）、月神（Mao）、风神（Oato）及“印度教”的湿婆神（Siva）等等。可以看出有大夏、印度、伊朗和西伯利亚的传统风格。

○秣菟罗的本土佛像艺术发展

秣菟罗（Mathura，也译成马土腊、马图拉）在印度的西北部与中部之间，是“耆那教”（Jainism）、“印度教”（Hinduism）和佛教的圣地。秣菟罗今名穆特拉（Muttra，马特拉），位于新德里（New Delhi）之南，在恒河（Ganges）支流朱木那河（Jumna river、Yamuna river）的西岸。

秣菟罗早在雅利安人（Aryans）入侵时，可能就已经是立足在重要的商业通道上。古译名还有摩偷罗、摩突罗、摩度罗，是盛产蜜与孔雀的亚热带地区。有佛教尊者目犍莲、舍利弗、罗侯罗、阿难及文殊师利菩萨等人的遗身舍利塔在此。

秣菟罗是印度本土佛像艺术化的重要地区，在西元一世纪末叶，也放弃了不雕刻佛像

的坚持，却在短期内创造出自己独立的风格。佛像改着「袒右肩」的薄衣袈裟，有别于寒冷地区的犍陀罗「通肩式」的袈裟；头发也不是波浪型，而是上卷的单一螺型，面部呈现着笑容。早期都是以当地土著达罗毘人的面貌外形为雕刻范本，后来才有佛陀三十二像的统一造像。而秣菟罗与鹿野苑都是印度佛像的制造中心，但各有其地方特色。

秣菟罗艺术强调佛身的健壮、华丽，呈现出肉体裸露的美与力，与犍陀罗时期的佛像安静沉思大不同。秣菟罗的雕刻师为了突显佛陀的神性，于是在佛陀身上加诸某些特征（lakshanas）：两眼之间有眉间白毫（urna），头上有佛顶髻（Ushnisha），手掌与脚心有法轮（dharmachakra）等等三十二像的美好都刻上。并且一改犍陀罗佛像那种沉静肃穆的气氛，把佛陀雕塑成一种孔武有力、雄壮健美的身躯，充满旺盛的生命力。

「大夏王朝」的希腊人曾统治过秣菟罗这个地区，后来又成为「贵霜王朝」的领地，是帝国东部的中心，她是「贵霜王朝」时期与犍陀罗几乎并驾齐驱的佛教艺术重镇。早期艺术是兼有犍陀罗艺术与印度本土艺术的风格，可说是犍陀罗艺术转向笈多艺术的过渡形式。

秣菟罗地区的雕刻品，是以带橘黄斑点的红砂岩为材料，色缓而具热烈感。与犍陀罗地区彩用青灰色片为材料，形成一种冷峻、沉重的感觉完全不同。由于印度本地崇尚裸体的肉体美，许多以红砂岩雕刻的裸体药叉女（Yakshi），就十分的醒目，以腰、肩、胯部扭动式的以S型三道弯曲线，表现印度女性特有的风姿。特别是大幅度的出胯动作以及丰满的双乳、浑圆欲弹的健美身躯，说明古印度艺术崇尚肉体美的情趣。

○笈多王朝的佛像艺术

晋元帝大兴三年（西元 320 年），印度「月护王」所建立的「笈多王朝」（Gupta Empire），是印度第二个强盛的帝国，统治领土虽然几乎遍及整个“次大陆”，但仍比不上「孔雀王朝」的疆土辽阔。此时期“印度教”与佛教是和谐相处的局面，位在阿旃陀（Ajanta）附近的庙宇，深入山丘地形，气势雄伟非凡。洞窟里的壁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是本时期的艺术杰作。同时也开始了北印度改良式佛像的刻创，其先后共有三百三十年历史，是「天竺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

「笈多时期」的秣菟罗样式与萨罗那特（Saranath，鹿野苑所在）样式的佛像雕塑，是延续「贵霜王朝」的犍陀罗佛像和秣菟罗佛像再演变而来。其佛头的法髻变为珠宝帽式，腰部由粗壮变为细腰，眼睑下垂，呈现出安详静谧的气氛。服饰由宽敞变为俗称“湿衣法”贴身式样，袈裟如蚕衣一般密贴于身，衣纹变为律动的新月形。笈多时期的佛像造型，后来随着佛教的传播，影响到南传与汉传佛教的佛像造型艺术，比犍陀罗佛像的影响更深远广阔。

「笈多时期」的佛像创造，这时已严格按照古印度所认定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美来雕塑。有着装饰华丽的圆形的头光，要求衣饰质薄以能显现肉体的健美为准，螺发垂耳，颈部三道纹，浑圆的肩部，扇形的胸，坚实的小腹等等，有着当地理想中的审美特性。

○波罗王朝的密教艺术

八世纪在东印度孟加拉地区兴起的「波罗王朝」(Pala Empire)，此王朝持续有四百年之久，其势力影响今东印度的比哈尔邦(Bihar)及孟加拉地带。波罗王朝盛行“秘密大乘佛教”(密教、金刚乘)，是「笈多王朝」后期佛教在印度与本土的“印度教”相结合，经长期演变而形成的教派。此时期的密宗佛像雕塑，打破了「笈多时期」的古典艺术准则。密宗把大彻大悟的佛陀提升到神的宝座，并推出一批新的佛尊与释迦牟尼佛并驾齐驱，此期佛像的动作姿态夸张，出现各式各样的手印，装饰则更崇尚华丽繁褥，背光采用尖拱、火焰等纹样。而「波罗王朝」的密教艺术风格，后来则影响西藏的佛教艺术非常深远。

佛教曾吸收“印度教”主神毗湿奴(Visnu)称为大自在天(Mahadeva，一切魔之王)，可是印度教徒却说释迦牟尼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佛教也把夜叉王因陀罗天神吸收为帝释天，把河神莲花女神拉克修美(Lakshmi)吸收为吉祥天女，历史上两教在兴衰较劲下，除了教法相互抄袭，其神佛也相互交流，「波罗王朝」的佛像艺术就如此丰富起来。

○佛像雕塑艺术的主题

世界各民族对雕塑创作，似乎各有天份。在佛教还没有传入前，中国的雕塑技巧已经非常的成熟，佛像雕塑的传入，更刺激了中国，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出更美丽的异彩。佛像雕塑的主题，大部分与绘画相同，常见的是佛像、菩萨像、阿罗汉像、天龙八部与供养人像。

寺院大殿中供奉的主要对象，如“印度教”以毗湿奴(Visnu)为主尊，两旁配侍梵天(Brahmadeva)与帝释天(Sakra devanam Indra)；佛教在天竺则以释迦佛(Sakyamuni Buddha)为主尊(最早是以太阳代替涅槃的佛)，两旁配侍梵天与帝释天为侍僧(西元182年的造型)，或目犍莲尊者(Maha Maudgalyayana)与舍利弗尊者(Sariputra)，在中土则改为阿难尊者(Ananda)与大迦叶尊者(Maha Kasyapa)。

来到“秘密大乘佛教”时期，以毗卢遮那佛(Vairocana Buddha)为主尊，两旁配侍代表智慧的文殊师利菩萨(Manjusri Bodhisattva)与代表大行的普贤菩萨(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即密教的金刚萨埵Vajra Bodhisattva)。到中土以后也有以释迦佛为主尊，两旁配侍文殊师利菩萨与普贤菩萨。

“汉传佛教”净土宗则以阿弥陀佛为主尊，两旁配侍观世音菩萨(Avalokitesvara Bodhisattva)与大势至菩萨(Mahasthamaprapta，即密教的金刚手菩萨Vajrapani Bodhisattva)。后来“大乘佛教”发展出来的「青颈观音」、「四臂观音」、「马头观音」以及「千手千眼观音」，也是源自“印度教”所称大慈大悲能普渡众生的主神毗湿奴。

佛教的四天王天是来自印度的传说，欲界最高级的六欲天其最初一重就是四天王天(

Catur-maharaja-kayikas)。四大天王「各护一天下」，世称「护世四天王」，即东方持国天王（Dhṛtrastra，白面王，提头赖吒）；南方增长天王（Virūdhaka，蓝面王，毗楼勒叉）；西方广目天王（Virūpākṣa，红面王，毗楼博叉）；北方多闻天王（Vaiśravaṇa or Dhanada，金面王，毗沙门，由“印度教”的财施天俱毗罗 Kuvera 所转形）。后来在《封神演义》里又变成了中国武将“佳梦关魔家四将”，成为职司风、调、雨、顺的天王。

由于南诏、大理国时代是印度密教“阿陀力教”盛行的时期，由“缅甸道”传入的“阿陀力教”是以在家修行为主。特别重视在家大菩萨维摩诘居士，因此见有“文殊问疾图”，将维摩诘大菩萨雕塑成面带病容的神色，以突显他自称“因众生有病，故大菩萨病”的大道。更因为“阿陀力教”也崇尚儒教，所以维摩诘手中握有一卷书。

○藏传佛教的佛像

“藏传佛教”的佛像造型，显然与汉地佛教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会有那些呈现暴烈、狰狞、恐怖、怪诞的佛像信仰，出现在同样也是佛教的寺院中？藏密佛像一扫佛教仁慈的面孔，反而把人性最丑陋的一面引入，深刻改变了佛教的雕刻艺术。这一直是“汉传佛教”或“南传佛教”教徒深感疑惑的地方。而其看来就是“淫欲相”的金刚明王双身像，怎么可能被戒行清净者所容许？就像汉传比丘看到来台的喇嘛们去吃蒙古烤肉，口中一定会直念阿弥陀佛。

依梵文文字所具性别，古佛像及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印度教”有重男轻女之父权思想，致其神与菩萨都为男性而言，「勇猛丈夫观自在」、「观世音」为男性之各种多臂变化身，无非都想超越源自“印度教”主神湿婆或毗湿奴的各种变化，但不知何时起，有些菩萨便成为女性，仍有待考证。

古代黑发棕黄皮肤的闪族人与蛇有甚深的神话关系，造成“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坐骑是阿难陀蛇（龙）王。后来造成密教金刚护法有甚多是以蛇王为璎珞缠臂等雕像，其渊源极深。更令人惊奇的是佛教护法神将韦陀天，原来在“印度教”里就是湿婆神的儿子，即知密教时期的经典已大量收编了印度的神祇。

在欧洲人的眼中，认为在印度的宗教与伦理的典籍里，充斥着数不清的夸言浮词，为的只是满足其特有的关怀：保持有系统地殚思虑的完整性。其中利用无限堆砌的修饰，用形容词、比较与象征，透过巨大的数目来加强伟大和神圣之印象的努力，以及淋漓尽致的无数幻想，再再使得欧洲读者筋疲力竭。难怪西方近代文哲大师韦伯研究梵文经典时，常觉表现得无比巨大、多采而富于幻想，便以「夸大！夸大！」四字作为结语。

后来密教更收编了“印度教”最高的神湿婆之不动忿怒化身为不动明王，“印度教”的诸神被采纳入密教，并赋予佛教思想的教化，都成为佛教的守护神，于是庞大的印度神话就进入佛教中无法分辨了，似是而非的神话恐导至信徒不易觉悟自性，一生在满天神佛中度过。

古代匈奴人与斯基泰人，会将敌人的脑盖骨与眉毛平齐锯开，其外包以皮鞘，其内嵌以黄金，作为酒杯之用。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南丝路演化的密教，出现护法右手持偃月弯刀，左手捧嘎巴拉（Kapala, A skull cup, 头盖骨作的颅杯）的造形，就是延袭古代草原野蛮的文化影响，或是为平服、转化其民族曾经受害的梦魇。

藏密“红教”三大护法之一的「一髻佛母」（Ekajati, Samantabhadri 本初智慧的普贤王如来佛母），其一眼、一乳的造型，很可能是源自公元前七世纪后期，出生于普洛康奈斯岛的希腊诗人阿利斯铁阿斯曾到中亚地区旅游时，并据他见闻所写下的长诗《独目人，Arimaspea》里记载居住在额尔齐斯河流域的斋桑泊附近的独目的阿里马斯普人：人口众多、勇悍善战、畜牧发达，他们毛发氍氍，面貌奇特，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的独目人。

也由于藏人居住在高地草原上，常常遭受冰天雪地的飓风横扫，在奔腾的河谷间，形成强悍的民族个性，但也增加了对大自然神话的恐惧。西藏如果不升华恐惧，以更狞恶的、野蛮的神祇信仰来震撼他们的心灵，是无法达到慑服民众的目的。

所以，从五世达赖执政开始，就大量出现有鲜血淋漓的人头、尸身的恐怖画像，极力宣扬天堂和地狱之说，采用气氛诡异、骇人听闻的复杂仪式，通过恐惧的规则和强大的保证，来让藏民信从，这种独特的社会心理，显然是比印度密宗更青出于蓝。

或许以上的说法是很冤枉的误解，不过从佛法的广大适应性来看，为迎合不同地区的民族，佛教自然会发展出不同的信仰崇拜。如关圣帝君在“汉传佛教”里被认为是“世间护法神”，而且清代北京“藏传佛教”东黄寺就建有关帝殿。在日本也有地方神皈依为佛教里的神，在“南传佛教”地区也把印度民族神话里的猴王，如此这般地纳入了护法神的阵容。

大昭寺的护法神殿内，在一片漆黑底色的墙壁上，用黄、绿、蓝涂料和金粉描绘出马头明王、金刚手、负背龙王、阎魔护法神和婆罗门神像等等。神像的圆睁怒目点缀醒目的白粉，张牙露齿的部位染成粉红色。无数狰狞凶悍的恶神模样，有如将迎面破墙而出，会让人感到窒息般的恐惧。

密教护法神的造型，与工巧华丽、堆金沥粉的佛陀画像，形成鲜明的对比。多姿多彩的藏密佛教艺术，似乎在述说人性善与恶的极致，把贪、嗔、痴三毒完全地呈现，而不加以避讳，不像有的民族作了太多不真实的掩盖。密教对性的看法也是露骨而直接，采取用性的“色染”来调伏阻碍修法的无明与魔障，因此，藏密有欢喜佛造型的出现。是知藏密的雕像极尽能力扭曲现时的安祥态，在宗教理性的支持下，成为教义的表征，信徒情感的记忆。下面就介绍“藏传佛教”著名寺院里供奉的主尊（Family lord），希望读者有所认识。

通常汉地称为“欢喜佛”（明代称“天地父母佛”）的双身交抱佛像，其中之一就是指“欢喜金刚”，也简称“喜金刚”，通常都是呈现与明妃拥抱接吻之立姿像，八头十六臂四足，头戴骷髅冠，冠上有一忿怒明王的头形。左右各八只手，手中都托着一个白色头骨

盖碗“嘎巴拉”，碗中盛种种富有寓意的神物：白象、红牛、青鹿、黄天地、白水神、青风神等等。明妃左手勾住明王颈，右手持偃钺刀上扬。两尊身上都悬挂有五十颗骷髅头串成的项链，象征梵文的五十个字母。明王左双足踩住三个仰卧之人，表示降伏了贪（desire）、嗔（anger）、痴（delusion），其右双足则向内翘蜷，站立在莲座上，以舞立姿而立。

《金刚顶经》：「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是知藏密采用“以欲制欲”的手段，显然是对应不同的民族风情。也把人性的善恶、真假、美丑、爱恨、苦乐、阴阳、纵欲与禁欲等等矛盾对立的现象，都纳入两性双身连体的形象中，表现出阴阳合一的太极思想，勾画出生命、世界和宇宙，是别有用心的。

“藏传密教”寺院还供奉有其他明王护法：时轮金刚双身，四面二十四臂，明妃有双面八手，以上两手拥抱金刚；胜乐金刚是站立的双身像，有四头为红、白、黄、蓝四面，分别象征权威、善静、发展、愤怒；具十二臂，腰间围虎皮裙，挂有人头一串，两手分持金刚杵铃，拥抱红色明妃；马头金刚双身，在红色猥张的鬃毛里有三个绿色的小马头正仰天嘶叫，金刚六只手各持“嘎巴拉”、索、噶杖等，左手拥抱“多罗”明妃度母；密集金刚双身，三头十二臂，主臂两手持金刚杵，拥抱浅灰色明妃，结跏趺坐在莲座上。

藏密认为三乘佛法中，以“大乘密咒乘”（金刚乘）的教法尤为殊胜。金刚乘教法主要开示四续部，其中“无上瑜伽部”的内容非常丰富，但以开示“方便续（父续）与“智慧续”（母续）的修法为主。在父续的方面分为三：对治贪欲的方便续，对治嗔恚的方便续，对治愚痴的方便续。

从《金刚精要庄严续》看到说：「密集金刚属于对治贪欲的方便续中，最为殊胜的修法。」或许是某些民族本性比较贪欲，故有此修法的必要。或许也为了导致裸而不秽、露而不淫，转化为心地的纯净与超越的目的。

在哲蚌寺大殿供奉的主尊（yidam）是大白伞盖佛母（藏名都噶）。根据《大白伞盖经》说“出有坏”如来顶髻中，出白伞盖金刚顶髻大回遮母，具千手圣母、千面圣母、百千万眼圣母。此佛母有大威力，其不二炽燃能放大光明，以净德覆盖一切，以白净大慈悲遍覆法界。佛母身白色，原三头九眼，在头上重重迭迭有多层头，如同高帽般；佛母身体周围有数不尽的手臂，形成一个大圆圈依序排列，很容易被以为是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每支手各有一颗眼睛，手上持有钩、索、弓、箭、杵等法器，最外环环绕火焰圈；最上右手持一白伞盖，有护国、安民、镇妖、伏魔的威力；脚下踏着无数的人物、飞禽、走兽，表示在佛母伞下能庇护众生。

甘丹寺的宗喀巴寝殿“赤妥康”供有文殊师利菩萨、大白伞盖佛母和尊胜佛母的鎏金铜像。文殊师利菩萨身色杏黄，肩有经卷，高发髻戴花冠，长发垂披散在肩旁，上身袒露佩戴环钏；藏语称为“措道那木玛雅”的尊胜佛母，有三面八臂，额上各有一眼，高发髻戴花冠，左脸是红色的，右脸是蓝色的，主臂两手托着金刚杵和绢索，左边第一手上扬施无畏印、第二手持弓、第三手持有花之净瓶；右边第一手托着小化佛、第二手持箭、第

三手作与愿印。（大白伞盖佛母像与哲蚌寺所供相同）

甘丹寺及强巴林寺的经院中，主供一尊怖畏金刚“雅曼达嘎”（Yamantaka，九头明王，藏名“多杰吉杰”）的泥塑像，是无量寿佛的忿怒现身，其相貌狰狞可怕，闪舌嗤牙，颦眉忿恨。身色青黑水牛头，拥抱蓝色尸起明妃“罗浪扎娃”阴阳两体交接，有九面二十七眼三十四臂十六足，以蜷右展左之势而立，以莲花为座，有红日、火焰等图案装饰；手持各种法器（右手握持钩刀、镖枪、捣杵、匕首、短枪、钺斧、戈枪、箭、钩、颅棒、喀章噶、轮、五股金刚杵、金刚锤、剑、查嘛噜；左手握持满血颅器、梵天头、盾牌、人足、器索、弓、人肠、铃、人手、尸布、人幢、火炉、半头、作期克印手、三角幡、风帆），足下匍伏各种天道或魔王（梵王、帝释天、遍入天、自在天、六面童邪引天、太阴、太阳）。

其表征：头之二角象征二谛（俗谛与真谛），九面表大乘九部经（即长行、重颂、孤起、本事、本生、未曾有、无问自说、方广、授记），三十四臂加身语意象征三十七道品（即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眼、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等修道资粮），十六足表征十六空，阴阳两体交接象征大安乐；右八足所踏人、水牛、黄牛、驴、驼、犬、羊、狐等八物象征八成就，左八足所踏鹭、梟、慈乌、鸚鵡、鹰、雕、公鸡、鹤等象征八自在；裸身涅盘像象征不染无碍，忿怒冲发象征妙道；体挂五十颗人头项链，其中三十四代表梵文辅音字母（Sanskrit consonants），十六代表梵文元音字母（Sanskrit vowels），表示学佛经的根基已有。（另有三十六臂尊，皆结期克印，执不同法器之造型，左足踏八禽表制伏梵天等八大天，表制伏一切毒见。）

甲域寺的贡康（护法神殿）殿内壁画中绘有女护法神祇骑骡天母（吉祥天母），藏语称帕颠拉母，据说她有百多种变化形象，原本是婆罗门教的主神之一，后被佛教吸收为护法神。吉祥天母（Srimahadevi，即Laksmi）凶恶至极，头上红色的猬发竖立，上有五个骷髅头，头发项上有半月和孔雀毛；右边耳朵上饰有小狮子，据说象征着听经；左边耳朵上挂有小蛇，为龙界的奖励；腰间挂着帐簿，那是专门记载人们所作恶事的记录，如果谁做了恶事，将要受到剥皮处置；她右手端拿着盛满鲜血的颅器，身披人皮，据说她大义灭亲，该皮是亲子或亲弟的皮，不管谁破坏了佛法她都不容。

吉祥天母骑在黄骡背上，骡缰绳是毒蛇，骡脚下是汹涌血海，象征她过了三界（天、地、海）；骡鞍前端有两个红白骰子，红的主杀、白的主教化；鞍前后有一荷包袋，里面盛着疫病毒菌，据说她是主生死、病瘟、善恶的神。骡的臀部还长着一颗眼睛，是被她父亲追赶所射一箭，拔出后长成的。

如果对于藏密佛像还不清楚其表征的涵意，那么近年来由于《西藏生死书》的畅销，已使我们知道中阴忿怒、喜乐本尊原来是自身心脑的变化。藏密《中阴救度密法》述说的吮血五十八「忿怒尊」（the 58 wrathful divinities），是由我人「脑部」所化幻像；四十二「喜乐尊」（the 42 peaceful divinities），由「心脏部」所化幻像。

因为人类是由海洋往陆地演化，在临终记忆体倒带时，在无始虚伪的人兽演化过程中，

所演出的情节有多种鸟兽的形态，属于人类进化过程中恐惧的记忆反射，也就是初期中阴身（意生身）所称见的诸多幻化的空行母众（Dakinis），以及民族生存过程中的梦魇。

《中阴救度密法》告知中阴身因为没有了肉体束缚，其记忆力、感知力扩大为生前的十六倍，密宗修行人也可在转投他道前觉悟。因此，活着时多读多认识有用的知识、多思维，对中阴成就很有助益。虽然密教的起源有吠陀说、土著说、道教说、混合说、大乘说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但由于藏密一些双身佛父佛母的交抱像——有中国太极阴阳思想的含意，表示相对与绝对、显现与空性、方便与智慧间永不改变的合一性。据泰米尔密教经典记载西元三世纪时，有精通中国道家学术的两位印度密宗成就者，是来自中国的，南印度泰米尔文称之为博迦尔(Bogar)和普里巴尼(Pulipani)，曾在伽耶等地传播道教医学和化学思想，留有禁咒、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在当时有着卓越的地位；唐代，道教已在东印度的迦摩缕波（今阿萨姆西部高哈蒂）一带流行，因此有关道教阴阳思想，是否此时期影响了印度密宗，尚待考证。

而事实上，藏密〈中阴救度法〉（The Bardo Thodrol，巴多脱卓）的教导，主要是希望受法者死后将投生时的淫欲诱惑，提升以神圣佛父佛母视之，更是可转化中阴投胎的执着。虽然并不见容于显教信徒，不过已有显密双修之居士，删改藏密之《中阴救度密法》，只提到临终时，母明光显现之对应，以及如何杜绝六道轮回，是很完整的临终关怀指引，颇受显教法师称许及宏扬。笔者于二十五年前即译白《中有闻教得度密法》，书名简称为《梦幻生死》，新编称为《西藏生死救度密法》。

藏密在汉、印和西域的崇山峻岭间独存，所酝酿出来独特的宗教文化，显得是非常庞杂，繁复得不易了解。如此采用矛盾转化、对立统一的作法，当然无法在本书中一一详加说明，希望有兴趣的读者，根据本书的蛛丝马迹，或许可以找到一条明路。

○千秋岁月计画

三法印中的「诸行无常」，是佛教徒都确认的。以前谁都不敢冀望百年以后的事，因为世事是无常的，更没有一位大师会晓得他发起兴建的佛寺，是否能维持百年。但是，我们早曾获悉了一个伟大的〈千秋岁月计画〉，比美于台湾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有一个藏密团体打算建造一座高 500 呎（152 公尺）的弥勒大佛（Maitreya，未来佛，强巴佛），曾在台湾成立「弥勒大佛工程台湾办事处」，并向有关的佛学团体寄发文宣。

这尊大佛的高度为纽约自由女神的 3.3 倍，将竖立在印度的菩提伽耶达（Bodhi-gaya）一千年以上。发起这个愿的耶喜喇嘛，在西元 1984 年三月圆寂，生前留下唯一的遗嘱：「要在印度的菩提伽耶建造弥勒大佛。」梭巴仁波切得到梦及神谕，在次年他找到耶喜喇嘛转世为他生前所教导的一对西班牙夫妻学生的小孩。转世后的宇色仁波切也得到达赖喇嘛的认证。

文宣中提到佛陀在《三昧帝王经》（恐怕也是后造经）说：画在岩壁上的佛像，即使有人怀着嗔心看它，也终究会导致那人看到一千万尊佛。所以即使只是看到画在岩壁上的佛像，便净化诸多烦恼及业的心，所种下的种子终究导致看到一切无数的佛。随着心在修道中发展，并且能够接受教法，就能够悟道。

佛像里面预计会配置有几个不同的殿，通常根据大乘密续，寺院或家里的佛像不能中空，都必须以圣物和咒文来充满装藏。所以大佛内部会有药师佛殿、二十一度母殿、千手千眼观音殿以及藏经殿等等。大佛心脏的部位将供奉佛牙以及尽量供奉很多的舍利，而且达赖喇嘛最近还赠送出释迦牟尼佛的八个舍利。另外已有一块过去佛的佛骨，可能得自一位蒙古高僧。将尽量搜集更多的舍利，供奉在大佛心脏的部位，好让人们来绕行、礼拜、环坐禅修。

大佛像的外围会有一座漂亮的花园，塑立各式各样的佛像，还有佛陀本生故事的介绍。以及计画建有一面墙，其上有很多佛塔，另一面有佛陀的十二个事迹。此外，一定会有很多转经轮和许许多多的圣物。文宣如是写着，也提到共襄盛举的功德是如何如何。如果在这种全球不景气的年代，提出如此庞大的兴建计画，而最后能够顺利建成，不致拖延，那真是「欧弥陀佛！」了。

○石窟壁上美艳的裸女

“淫”是佛教徒的第三戒，在石窟壁上特意绘上丰乳、细腰、肥臀的美艳裸女，算不算犯戒？克孜尔千佛洞里有太多的伎乐、舞姿陪衬，王妃、魔女、宫伎、舞女有半裸、有全裸，对出家僧尼是否为禁忌？

古代母权社会的希腊崇尚裸体美，最喜欢以石雕表现出人体与心灵的健美合一，龟兹的艺术家直接受到希腊艺术技巧的同时，也接受了它对裸体的观念。在西方绘画里裸体（nude）与不穿衣服（naked）是有区别的，裸体是理想化的人，如〈亚当与夏娃〉的版画是裸体的；不穿衣服则是非理想的现实人，是应该穿衣服却没穿的人。

克孜尔千佛洞原在 205 号窟，在已被德国人剥走的〈阿闍世王故事〉中，阿闍世王（Ajatasattu）身边的王妃全身裸体，一丝不挂，而在另外一幅构图相同的〈阿闍世王故事图〉上，王妃却穿上了衣服。阿闍世王在王宫接见大臣时，王妃在旁作陪理应穿着衣物，然而却绘出裸体的王妃。

从近代在天山南北所发现，古代龟兹父系氏族时代，已有大量的裸体艺术岩画看来，龟兹人体艺术的表现，若说是缘自希腊或印度，显然不正确。或许在龟兹艺术家的理想中，为表现王妃的美，显示王妃的地位，唯有裸体，不然不足增加她的光彩。这是一种传统艺术的要求，更是社会观念的要求，我们就不必以为奇怪了。

基于如是的的要求，龟兹艺术家一再地描绘裸体的摩耶夫人。因为根据佛经的记载，摩耶（Maya）夫人能够生下“佛陀”这样的圣哲，除了她高贵的教养外，应该具足了最理

想的美丽体态。

所以雷奈·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转引《神通游戏经》写作《印度的文明》中写到：「她正当如花的妙龄，艳丽无双。她有黑蜂似的头发，纤细的手足，迦陵伽衣似的柔软身体，青莲嫩瓣似的明眸，曲如彩虹的玉臂，频婆果似的朱唇，须摩那似的皓齿，弓形的腹，深藏的脐，坚实丰满的肥大臀部，象鼻似的美好光致的大腿，羚羊似的小腿，玫瑰胶脂似的手掌脚掌。」无疑，摩耶夫人应该是值得赞美的。

而且处于亚热带、热带地区的印度，人们衣着本来就不是厚重的，有些土著就有不着上衣的习惯，妇女露出乳房本属司空见惯，也不见得是色情。而处于纬度较高的中原地区，在寒冷气候下的人，大多衣着较厚重，加上礼教的严谨，“汉传佛教”的艺术绘制，就不会有裸体的形象出现，甚至半裸都是禁止的。所以进入到高昌地区的绘像中，裸体画像就逐渐减少。

在回鹘（纥）时期，半裸的菩萨像就几乎见不到了。所以在克孜尔千佛洞全裸的天人、伎乐和菩萨，到莫高窟时都围上了裙子，上半身仍裸露着。在克孜尔千佛洞原孔雀洞的壁画〈降三魔女〉，原来是妖艳全裸的呈现，到了莫高窟时，好像是相同“粉本”的画，年轻魔女上上下下都用衣物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体型显得膀大腰圆，反应出当时民族的审美观点。

○小结

从佛像的制作历史演进可以看出，世界各地的佛教徒原来只是为了感怀佛陀，后来却是为了视觉上的满足，于是历代艺术家们在塑像上“追求人性”，“追求肉体的美和官能的魅力，甚于追求佛的精神”，而迎合各地的民情风俗，描绘、雕塑出各式各样的佛像，其实都可说是基始于希腊人的创见，或许初期那只是希腊人的多事。但是最后佛教徒们基于「护教」的情感，竟然发展出如此庞大无比的佛像群，却是始料所未及。

本来「成佛」之道就是「觉悟」之道，可惜佛教偶像化之后，很容易误以为修行就是要成为供桌上的那一尊。虽然密宗是特别注重偶像的一派，如果认识密宗的人，就知道佛像是学习的对象，先从「对生本尊」的观想，再转为「自生本尊」的训练，到了〈大手印〉或〈大圆满〉的阶段，这些像全部要观空。可是显教不明白这种过程，反而在觉悟之前无形中有一个像的阻碍，不能够直接契入，信众的误会如此，外人可就更加迷糊了。